

# 纪实

## 黄河纪实

### 一

是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黄河边上碰上了县委书记许浚。我说：“许书记，佳县这么穷，你也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吧！”我单刀直入。因为凡来佳县的领导大都不想来，来了板凳还没坐热就想走。

“我怎么不想换一个地方，这能由我吗？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命，我命里就注定，该在这个穷地方呆上几年。”他没有耍官腔。

“人心都一样，那一年组织上突然决定叫我去西藏去工作，我也不愿意，我心里想，这颗冰雹怎么就端端砸在我的头上？我家里有老父亲，有妻子儿女，我到了那里不仅照顾不上他们，连我这把骨头也许撂在那里了，我心里能同意吗？但是，这是组织决定，不想去也得去。亲戚朋友，街邻巷里都知道了，我就是不敢把那事告诉我父亲，父亲那么大岁数了，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绝对不会同意的。其实父亲早就知道了，只是不愿把这层纸戳破。那一天他把我叫到房子里问我，我还是不告诉他，他却说：‘你不要瞒我了，我早就知道了，你去，你去，这是圣命，圣命能违吗？’父亲边说边抹眼泪，我也忍不住了，一个劲地流眼泪……”

“后来总算又调回来了，只说好好守着父亲，可又被调到佳县。佳县穷，我早就知道，我们那里有个杨桥畔，住好些佳县人，都是没办法，移民移到那里的，所以一通知让我来佳县，一个‘穷’字就压在我心上，到佳县一了解，果然是穷。老天爷也实在是不公平，神府榆林都有煤，就佳县没有，要点黑炭都没有，地下没有资源也罢了，地上的资源也该丰厚些，嗨！地上也没有多少资源，峪口乡谭家坪村，一个人劳动一年，分过一斤糜子二斤谷，这真是世界级的贫困地区。老实说，当今社会，要在一个富裕的县当县委书记不易，在这么贫困的一个县当县委书记就更难。一个县穷，不能只怪老天爷不公道，人家也有把穷地方搞富了的榜样，人家能搞上去，自己为什么不能？因此我下到乡里，只怕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还是个县委书记！你是个干什么吃的？怎么就把一个县弄得穷成这个样？可佳县人厚道，只怨他们生在这么个穷地皮上了。佳县的干部也好，三月两月不发工资，照样干工作，有的干得还挺好，从这个意义讲，佳县是个好地方，主要是人好。我不敢奢望能在这里做出什么政绩，但我要对得起这里的人民，对得起这块贫瘠的土地，当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觉得

心里无愧，就够了……”

寒风在河谷里呼啸着，卷起黄河滩头上的沙子、枯冈上的碎石逼得人难以透过气来，我们只得把身子转过去，缩着脑袋任沙子往脖子里灌，峡谷里的风说来就来，说停就停，一风过去，天照样那么蓝，云照样那么白。我们顺着黄河岸边崎岖的石路，边走边拉。太阳升得很高了，河谷上空升腾起一层青纱似的帐幔，远处的山隐在青纱后边，显得十分凝重、神秘、飘渺。黄河上没有浪，黄河会哭，也会笑，哪一种浪声是河哭，哪一种浪声是河笑，只有长久生活在河畔上的人才能听出来。太阳的反光，使河面现出一种金黄的颜色，耀眼的亮，就像流动的不是水，而是金。我感到我们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沿着黄河漫步，真是一种难言享受。大自然不愧为伟大的艺术大师，在黄河两岸雕塑出了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长江三峡上的神女峰不也是一块酷似一女子的石头吗？一经名人题点，便成了闻名天下的奇观异景。这晋陕峡谷上的许多景观，如果有幸被名人题点，不也会闻名于天下吗？

置身于这么一种环境里，谁也不会再想到佳县穷了，地下的资源有完、有尽，可大自然的造化却是无穷无尽的，这是老天爷给这里的一种特别的恩赐。我们不知不觉登上了个石坡，尽情地观赏起黄河风光。

前面有个酷似仙人的石峰，我指着问：“你看，那像什么？”他专注地看了半天，说：“那不像个老翁，长须老翁吗？”我说：“那叫仙人峰。”其实，在此时，我已是触景生情，在胡编故事了。“传说，这黄河石崖上有过一个九女庙，现在这九女庙已被逐年淤起来的泥沙淹没了，我想那是世界上绝妙的石窟艺术，可惜我们看不到了。那仙人峰下，或卧或坐的各种造型的石头，都酷似人形，那便是仙翁的弟子。仙翁常常在这里讲经说道，引来了天下无数的名人学士。有九个女子也不远万里来求学，不想，在山下就被他的弟子挡住了，说她们是女流之辈，有辱仙山，九个女子十分好强，一气之下便跳崖身亡。仙翁知道这件事后，感其诚，便请了天下能工巧匠，凿石为庙，雕刻了九个天仙似的女神……”

老许听得入迷，说：“你在黄河畔跑了这么一段时间没有白跑，知道了这么多事情，你何不写成书让天下的人都能看看。”我说：“我是有这么个打算，可我这支笔太笨，就怕写出没有人看，如果我是一个名人，经我这么一写，这一带也就有名了。这黄河是一部流淌不完的历史，那裸露的岩层就是一叠叠厚厚的史册，翻开每一页上都有悲欢，都有兴衰，黄河留给了我们贫穷，也留给了我们一个艺术的天地。我到过长江三峡，黄河峡谷里的景观不比长江三峡差。这是一个天然石雕艺术长廊，人面石、蛤蟆石、鼓石、磬石、空灵石、奇文石，各种各样有名气的石头都有。那奇文石就在秃尾河附近，那崖石上生有奇文，或如云，或如车，或如横桥，或如长梯，或如龙凤龟蛇，或如古柏老松，或如楼阁宫殿……”我说到这，

许书记听得更为出神，说有机会一定到那里看看。我说这峡谷里，奇异景观多得很，有石嘴峰、狮子崖、龙虎湾、青龙岩、金佛岩、落珠岩，这每一处山岩，每一座山峰都有一段美妙的传说……

前边出现了一处龙王庙，许浚爱好书法，常以三边友人的名义给朋友题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天下为公”等等。一进庙，便走在一通碑前看碑文，这碑立于大清乾隆年间，由于风雨剥落，碑文已很难看清，唯开头几行清晰可鉴，上书：生万物者天，养万物者地，成万物者水。许浚品味着这几句话，说：“这几句话说得好，可惜没有把人写上，三才者天地人，怎么不把人的作用写上。”我说：“‘老子说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那个王指的就是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我们正准备展开讨论一些哲学的话题，就在这时从上游漂下来一只船，船上的人喊叫着说，叫许浚立即回城，原来陕西省交通厅、山西省交通厅就筹建佳临黄河大桥的事，要在佳县山城召开会议，许浚听到这消息，真高兴死了，不顾膝盖有骨增生的毛病，忍着巨痛，跑下坡，此时，我发现他头上已冒出许多豆大的汗珠。

我们登上机动船，顺流而下，船头上风很大，也很冷，船工们把他们的皮袄给我们披上，我俩还觉得很冷。于是，坐在船舱里，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可我看得出许浚激动的情绪还是难以平静。因为，为了修建佳临黄河大桥，他和任玉德县长、马旭耀副县长，还有别的领导都费了不少心血，现在能在佳县召开这样的会议，实在是不容易啊！

顺水船快，眨眼就看到香炉寺了，坐在船上看香炉，更是奇绝。在嶙峋的崖壁上，悬空建造了一座庙宇，庙宇的南端，伸出一条细细的栈桥，连结着另一块与悬崖分离的怪石，怪石上险险儿座落着一间挑檐小庙儿，远远看去，恰似一个极精致的香炉。弯弯曲曲的古城墙依山而建，像一条黛色的缎子缠在山城腰里，再往上看，便是错落有致，鳞次栉比的居民建筑，那些建筑被映衬在蓝色的天幕上，似仙境一般。古城墙东南角上矗立着一座七级宝塔，像一柄银色的利剑，直指着蓝汪汪的苍穹，登临塔上，会有“挠首接鸿蒙，去天不盈尺”的感觉，因此叫它凌云鼎。

已经偏向西边的太阳把整个山城的倒影、把那塔的倒影投在黄河水面上，可惜黄河水是浑的，如果待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一天，这倒影一定会成为万里黄河一大奇观。未来的佳临黄河大桥就要在这儿破土动工，这使全县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佳县山城和过节一样热闹，县招待所门前挂出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热烈祝贺佳临黄河大桥协调会在佳县胜利召开！各机关、团体也都书写出祝贺标语。机关干部、城市居民、临时进城的农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在议论修桥的事。

晚上，我估计许浚已回到家里，又去找他。他刚刚在县招待所安排好客人，回到家里。他的老父亲很孤独，行动已经很不方便，加上到了佳县人地两生，哪里都不去，常一个人在炕上玩牌，儿子回到家便要陪着父亲玩一会牌，边玩边拉拉家常。我知道，许浚现在也很累了，又是下乡，又是接待客人，又是开会，回到家里还要和父亲玩，玩的时候，还要十分认真，稍有一点心不在焉的表现，父亲就不和他玩了。我一进门，老人就对儿子说：“你有公事，咱不玩了。”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到他家造访，无论是对老人、对他的别的家人，还是对许浚都有点残忍，但他是个县委书记，他不受这样的罪让谁受呢？

谈话的主题自然是大桥了。他依然很有兴致，难怪人家叫他“跑桥书记”，一提起桥，他就好像累也不累了。他说，修建佳临黄河大桥是多年来两岸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专家学者们的科学论证，修桥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争取这个项目的勇气从何而来？来自科学的认识。我们请来的教授、博士，经过认真考察，认为黄土高原晋陕峡谷贫困带区域经济启动的严重制约是流通不畅，黄河的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的经济、文化、科学、人才、资金等方面的联系。尽快修建佳临黄河大桥是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由于我们有了这种认识，就有了争取建大桥的勇气。下西安，上北京，过山西，到井冈山，不怕丢面子，不怕人家冷眼。出去找人，人家火了，咱还得陪着笑脸，人家不理咱，咱还得没眉赖眼想办法让人家高兴。现在就是在咱县里要办一件事也很难，更何况这件事牵连中央几个部门，牵连两个省，投资又那么大，事情就更难了。难也要办，佳县人没有一个不支持这件事的。李文光是咱们的老县委书记，为修桥在北京跑了好几回，有一回我们到了太原，正是腊月天，冻得厉害，晚上睡的时候，李老脱不下裤子，我帮他脱裤子的时候发现他的一条裤腿冰冰的硬硬的。我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笑着说，孙子把他的裤子给尿湿了，起身时忘记换了。我知道他在哄我，他有糖尿病提不住尿，全尿在裤子上了，我当时真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我说，李老，你这是为了什么呀？你为什么答应我到这里来呢？你这是为了什么呀？我真后悔不该把李老请出来，因为他的老伴也在病中，他不能离开家！李老想跟我走，又不放心。我怕李老不跟我走，又怕他走了家里出了问题。他的老伴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死不下，他在家也替不了我，能给佳县人民办了事，你就把他领走。”我把裤子给他脱下，立即到街上给他买衣服，跑了几个百货大楼都没有买上。我突然感到很累，浑身软得不行，回到招

待所吃饭，手抖得不行。心也烦得厉害，我意识到我又要犯病了，号了一下脉，139次。李老一看不好，叫我不动，无论如何不能动。当时又没有个医生，李老立即把给他备用的人参给了我一块，让我含在嘴里慢慢嚼。我感到一阵不如一阵，当时已经意识到死，心想就这么死了吗？我还有老父亲，还有妻子儿女，不给他们说一句话就死了吗？说到这，许浚哭了。

为了佳临黄河大桥有很多同志出了力。黄河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许浚。有一回，他到北京听说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已到北京，他要找他帮忙，当找上时，张勃兴已到机场，要到日本去。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赶到机场，去找省委书记，人家愿意不愿意意见他，能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他全然没有考虑。只凭着为佳县人民办事的一颗热心，什么都不考虑了，张勃兴被他这种精神感动了，是呀，如果每一个县委书记都能像许浚一样，工作能做不好吗？

### 三

我走进任玉德县长办公室，他告诉我：“世界银行亚洲农业处处长查理·哥瑞姆肖要来咱佳芦河流域考察，我想咱得做个电视专题片，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

“什么时候要片子？”我问。

“按省上通知的时间日程表，再有十天就到咱们县。”

我马上意识到任务之繁重，因为时间太紧，只有十天的时间，又要写脚本，又要摄像，又要剪辑配音。县里的设备还不行，得请地区电视台拍。他看我有难色，来了个先发制人，说：“这事就定下来了，我知道你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而且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他看我还有些犹豫，说：“我知道，你对佳县的事是很热心的，也有这个能力完成，这我早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是一片云，能下雨，下一两场雨，不能下，风一吹就走了，而你们是一棵树，要在这块土地上扎根的，佳县的事说到底还要你们佳县人做。”我打断任县长的话，说：“我做。”接着任县长谈了拍片的要求，应表现些什么，注意的分寸，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最后，他说：“虽然我们穷，但要表现出我们佳县人的志气，君子之志，穷则更坚。”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于佳县来说，佳芦河流域的治理如果能争得世界银行立项，这是决定佳县能不能摆脱贫困命运的大事。我提出立即要去采访，他说马上派车，而且他要亲自带我们去采访。刚准备动身，地区来了电话，说省里派人马上就到，要他去接待。于是他给人大米迎贵主任打了电话，让他带我去采访，米主任也不推辞，我们很快离开了县城。

采访工作是十分紧张的，采访什么点，县水利局张永明同志知道，他是一个水利专家，一路上我向他学到不少的东西。从采访到写成脚本，只有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我们从早至晚，跑了两个县、七个乡、十几个点，白天跑一天，晚上写脚本。到第四天，佳芦河流域介绍电视专题片的脚本初稿总算出来了，我在初稿里写道：古老的黄河，穿越晋陕峡谷，飞流南下，在它的西岸——佳县山城脚下接纳了佳芦河。佳芦河是佳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它纵贯县境中北部，流域面积 1136 平方公里。

佳芦河发源于佳县北部榆林市的断桥村，源头从古长城脚下一个小山沟里流淌出来，其上游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这里山梁连绵，起伏平缓，沟谷宽浅，片沙间盖，而它的中游则梁崩起伏，沟壑纵横，地面破碎，坡陡崖峭，到了它的下游我们看到的是窄谷深沟，裸露的基岩，草木难生的瘠土。佳芦河从源头到入黄处，流程 93.2 公里，源头海拔 1284 米，入黄口海拔 700 米，相对高差 584 米。在这不太长的流程里，佳芦河又接纳了许许多多的小支流，其中流域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大沟就有三条，大大小小的沟道 2046 条，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2.02 公里。佳芦河是黄河晋陕峡谷中含沙量较大的一条支流，据测，这个流域与陕西省黄河其他流域比只占 0.9%，然而输出粗沙却占到 3.6%。

佳芦河流域属中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只有 400 毫米以下，雨量往往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的几场暴雨之中。每逢暴雨时节，山洪暴发，泥石流下，便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据测，全流域平均每平方公里每年就要流失 1.7—2.9 万吨土壤，相当于剥去 15 毫米厚的表土，算起来，全流域每年损失表土中含的氮、磷、钾就有 25.27 万吨至 40.33 万吨。这是一些多么惊人的数字啊！威胁这个流域的另一个最大的自然灾害就是旱灾。日照充足，蒸发量大大超过了降水量。“十年九旱”，“春雨贵如油，”“秋晒如刀割”，这些农谚充分反映了这个区域旱灾的多发性和可怕性，在这里常常出现春旱、春夏连旱的年份。当人们还没有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情况下，在旱象最严重的时刻，农民不得不向神灵祈雨。这个流域水资源又异常缺乏，属陕北长城内少水区，人均占有水只有 919 立方米，不足陕西省人均占有水的 3/5，是全国水平的 1/3。这个流域地下水开采量少，开采利用难度大，发展灌溉受到极大的限制，好些地方人畜饮水都难以解决。

据史料记载，在四百年前这一带还是林茂草丰之地，由于长久以来人为的破坏和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严重地恶化了生态环境，昔日的黄土高原已成了荒山秃岭，满目荒凉。随着人口的不断发展，生存危机日趋严重。然而我们的祖先却在这里生息，繁衍，拼搏。

方塌乡谢家沟村过去是个很穷的村子，1948 年一次旱灾就饿死十三口人。他们从五十年代开始治理山河，经过四十年的奋斗，粮食产量由五十年代的 1.5 万公斤，提高到 1990

年 37.46 万公斤。他们兴修的农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 10%，可产粮却占到 69%，他们还种草植树，发展牧业，现在，全村 135 户人家，571 口人拥有 5000 亩林草，5250 只羊子。谢家沟人终于告别了贫穷，走上了富裕。

打火店村位于佳芦河中游。1956 年开始向穷山恶水开战，到 1990 年底，修水地 750 亩，坝地 27 亩，梯田 345 亩，造林 5500 亩，其中果园 600 亩。粮食产量由 1971 年的 20.75 万公斤，提高到 1990 年的 39 万公斤。农业总产值，由 1971 年的 19 万元，提高到 1990 年的 44.58 万元。和过去相比，打火店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此看来，佳芦河流域发展经济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这里出产的糜谷、豆类、烤烟、果品、薯类，种类繁多，品质优良。佳芦河流域出产的洋芋，制造的“环状糊精”在陕西省第二届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荣获金奖，成为佳县唯一的轻工出口产品。

根据多年来的治理经验，要改变贫困的面貌，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和实现的，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劳力，要苦干、巧干、持之以恒地干，才能成功。

由于资金短缺，严重地制约着治理速度，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佳县人民当然希望架起和外界联系的桥梁，和国外一切愿意合作者共同完成开发项目，使佳县经济好转……

这就是我这次采访获得的初步印象。采访是很粗的，时间虽然短，但我却了解了许多我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看到了终生难忘的景观。印象最深的要算崖窑洼那几户住在崖窑古堡上的人家了。日积月累的水土流失，把浑厚的黄土高原，切割到地层的深处，黄土高原在这里才展示出了它的博厚和伟大。山民们在坚硬、红色的胶土层中挖下洞穴般的住处，时间久了，沟在加深，崖势在增高，便把洞穴吊在悬崖上，山民的子孙们又在山根挖同样的洞穴，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过了多少辈，在悬崖上留下了一层一层的洞穴。我很想到那古老的洞穴里看看，可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无法攀登。在这个古堡里，农民粮食很多，洞穴里用石头垒一个大仓，也没有顶，满满倒一仓粮食，任老鼠在那糟踏，院里则用柠条编一个躺柜似的大筐，用泥一抹，也装的是粮食。我问山民们，为什么不去卖呢？他们苦笑一笑，说，我们驴驮？人背？到了集上一时又卖不了，盘费下来，鼻子比脸都大，划不着啊！

干渴的佳芦河流域，祈盼着一场好雨，一场滋润万物的好雨。按原定的时间日程，查理·哥瑞姆肖一行，在国家水利部、财政部以及陕西省的一些官员的陪同下，于 6 月 2 日到达了佳县城。

封闭落后的佳县，接待外宾还是第一次，上面通知一定要接待好，吃、住、行的要求很严很细，甚至要求在打火店村的山上必须修一个供外宾用的临时厕所。佳县的一堂领导为此

事大伤脑子，佳县这么穷，没有山珍海味，即使从外面买来，也没有厨师会做，佳县也没有高级宾馆供外国人住，只是几孔窑洞，就这么个条件，怎么接待呀！讨论来讨论去，定不了弦，最后任玉德县长说：“外宾也是人，到我们这里来不是为了吃喝，根据我在神木的经验，外国人好接待，难接待的是我们中国人。”他提出来办一个豆腐宴，一个面食宴。豆腐榆林有的是，豆腐食品也是榆林人的绝活，面食也不用特别的什么花样，请几个巧手老婆，捏些十二属相，在盘子里一搁，谁属什么谁拿什么吃，肯定外国人喜欢。

这一招还真绝，豆腐宴二十二道菜全要了豆腐。一个人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这豆腐宴，对查理·哥瑞姆肖来说，出娘肚皮还是第一次，他当然十二分的高兴。面食宴就更绝了，餐桌上摆的不是食品，而是精美的艺术品，谁舍得把它咬碎呢？查理·哥瑞姆肖翘起大拇指，OK，OK，一个劲地夸奖，他拿着这些艺术品不忍吃，让厨师在烤炉里给他烘干，他要带回联合国，带回荷兰，带给他的妻子，带给他的儿女，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念。查理先生说，这是他到中国来，最难忘的宴会。

县政府会议室布置一新，电视机、放像机都已试好，安放在外宾席的对面，外宾座席前放了两盆不知哪里弄来的花。9时许，外宾在榆林行署专员贾建文的陪同下，来到会议室。别的参加会议的人早已坐好了，查理先生一进会议室便抱着拳头频频点头，用英语说：“很抱歉，我来晚了，你们这个县城，是我到中国以来，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县城。”

我们的县城确实很美，东临黄河，西绕芦水，只有北边用一座旱桥和黄土高原连接起来，查理先生的这番赞美话，绝不是出于礼节的应酬，是他感情的流露。我们佳县虽然穷，可穷是可以改变的，这自然的造化，却是最难得的。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资源的话，在我们片子里摄下了许多表现佳县山水自然美，原始美的镜头，一定会使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会议第一个议程就是看片。整个片子只有17分钟时间，事先没有搞翻译，翻译只有临场作。一个翻译，边看边翻译。看完之后，查理先生说：“片子很好，请允许我带到华盛顿，让我的同事也看看，可以吗？”任县长立即表示同意，查理先生用英语道了谢。

我心里很激动，如果佳芦河流域的治理能在世行立项，这将是佳县史上一件大事，我能在这件事出点力，是我的幸运。

中方项目负责人做了汇报之后，查理先生说：“我实地看了两天，只看到你们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我很乐意住上一周和农民朋友一起交谈，我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很坦诚地说：“你们准备的流域材料很好，因为你们提出的要求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我不想重复我在别的地区说过的话，我也不想把会议搞的很长，就技术方的问题，我谈点意见。可以说，我现在完全被你们说服了，你们的水土保持技术是非常可行的，同时，你们的工程措

施，梯田，坝，相当有效果，在当地的农民看来，那些水利设施成了他们的生命。我看到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还在修梯田，虽然工程不怎么样，就农民看的角度和我们不同，因为农民看到的是土地，以及土地保护带来的经济收入，当然，在我们看来，除了看到这些，还有资源的保护。土地在这个流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尽可能地不损失一丝的土地……”

查理先生说话很幽默、生动，他说一句，翻译翻一句。最后他说：“你们搞的这个项目，符合世行的要求，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好，特别好。不是你们作为东道主特别热情，我是说，在你们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县，技术人员的工作做得很好，还有你们拍摄得这个电视片，它使我看到了许多没法看到的東西，它使我对佳芦河流域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你们这个县没有什么资源，官员们能到北京争取这个项目，和世界银行争取这个项目，这就表现出了对人民的一种负责精神，对这块土地的负责精神，你们这里的人民不希望有更多的水土流失，同时，黄河下游的人民也不希望更多的泥沙流到他们那里……”

查理先生满意地走了，带着佳县人民的希望，带着这片焦渴土地的希望，也带着我拍的照片……

#### 四

许浚去南昌的途中，给我发来一封信。

海燕同志：

你好！最近，我们在西安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议，就《佳县经济发展研究》那本书及开发治理黄河石洼的事，我们给省里的领导和一些专家，进行了汇报，省上很满意，专家们评价更高，“手中有良方，何愁不回春”，有了这本书，我们就有了希望。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导演听了开发治理黄河石洼的汇报，很感动，他们提出要帮助咱们搞一个新闻纪录片，他们计划11月份就来拍，你得很快把脚本写出来，西影的编导说，他们过去和你打过交道，知道你的文采。我要去南昌，中央在那里正在开全国计划会议，我要追到那里，给中央的领导同志说说黄河大桥的事……

在搞《佳县经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我和许浚接触过很多次，他是个易于激动的人，

心里藏不住什么，有时你会感到他说的话，不着边际，不是个系统的成熟的思考，可他的谈话，确也不乏一些闪光的东西。我以为他可贵就可贵在这里，如果一个只会重复别人的话，重复文件的话，毫无见解，当官还当的有什么意义？

佳县到底有没有出路？有没有希望，路在何方？路子怎么走？这个问题，他思考得最多，他走遍了全县东南西北，访问了很多先辈，结交了不少科技人员，征求了许多意见，“得病身无主”，见了医生就求医，就想为佳县找到一条希望之路，为佳县开出一个治穷的“良方”来。但是，他说：“嗨，我原来以为我还能行哩，弄来弄去，连佳县的穷病根也找不上，就像一个赤脚医生，去抢救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可笑，他第一次感到了他的无能，他向书本请教，向一些高层次的科技人员请教，书本使他受益不浅，科技人员里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但是，弄来弄去，还是开不出一个治穷病的方子。这时他更强烈地感到我们的事业是多么需要科技人才啊！多么需要高科技人才啊！然而科技人才却在这块贫穷的地方呆不下去，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得不离开这里。

1986年，许浚回靖边老家过年，恰逢他教小学时的一个学生也回家过年，新春佳节，师生欢聚，也是人间乐事。那个学生叫史培军，年纪轻轻，就荣获了博士学位，已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一名教授，他貌不惊人，可在说话中，许浚发现他的知识很渊博，见解深刻而新颖。于是他突然又想到了佳县，他对史培军说：“培军，你能不能帮帮我的忙，佳县那么穷，我到那里，真是老虎吃天，无法下手。”史培军真想帮帮他的启蒙老师，可他正在研究几个课题，根本没有时间帮这个忙。他看许浚很失望，心里很过意不去，就讲了许多他自认为需讲给他老师听的东西。第二年春节，他们又都回老家过年，许浚又一次邀请史培军帮忙，史培军答应了，不过，他说，要研究一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必须进行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就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得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地理研究所，国家航空部等科研单位的学者专家共同研究，才能完成研究任务。

也许贫穷也是一种召唤，也是一种诱惑，那些学者、教授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在佳县的穷山沟里收集资料，进行严密的科学考察、分析、论证。于1998年10月，写出了《佳县经济发展系统研究》可行性报告。同年11月，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一次《佳县经济发展系统研究可行性论证会》。有十几位全国著名学者、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许，在中国的版图上很难再找到比佳县更穷的地方了，因而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闫揆要看了报告心情很激动，给中共佳县委的信中说：“论证报告我看了，很好，很重要，我对你们、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员非常感激。这一研究计划的完成，需要相当的时间，我想：在全面的研究过程中先选一两项短平快的项目，抓紧具体落实发展，以增强人民的信

心，必要时还可以扶助你们的研究费用……”八旬高龄的闫老，不仅详细看了数万字的报告，而且以军事战略家的目光，为家乡的振兴选择突破口。同日，他又给陕西省省委书记张勃兴写了信，信中写道：我国西北现在还是一个贫困地区，佳县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还是陕西最贫困的县。现在，佳县的同志请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佳县，寻找脱贫致富的路子，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们能完成此项研究计划。不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培养经济人才，而且对我国西北发展经济，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起很好的引导作用。

学部委员高景德教授对这项研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扶贫致富，先从经济战略入手，十分正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对佳县的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类似贫困地区也有普遍意义。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取得具体研究成果的同时，创造出扶贫致富的新经验。

可行性论证会开得很好，很成功，在我们的首都，请了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专门研究一个最贫困县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会后，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航空部、北京食品研究所的一些年轻的教授、博士和佳县的科技人员，组成了十七个项目专题组，开始了研究工作。于1990年9月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区域性经济发展研究专著。这本书十分精辟地提出了佳县经济发展“一控三基”的模式（控制人口、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基础产业，建设基地农业），以及佳县经济发展战略。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认为这项研究是一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战略研究与具体实施相结合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国内同类研究中明显处于领先水平。

许浚书记，任玉德县长，拿着这个成果，给省里的领导汇报，自然会引起重视的。佳县的实践证明，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需要科学技术，高科技的触角一旦伸向贫穷，再贫穷的地方也能迅速变样。这一研究成果使全县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之光。而作为佳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心里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借助科学，获得了对县情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他们似乎觉得治穷的“良方”有了，启开富裕之门的钥匙拿到手了。因而他们变得更勇敢了，更聪明了。

## 五

我拿着许浚的信去找李俊治副书记，因为他是治黄领导小组组长，恰巧，他要到螞镇一带去下乡，于是我们同车前往。此人面冷，话少，红脸忠，黑脸直，生着一副铁面，两腮又

很丰满，批评人尖刻不留面子。

我和李俊治接触甚少，互不了解，坐在车上，一时还没有找到什么话题可扯。我们盘山而下，转了几个湾，就能看见龙虎湾了。县级机关干部正在那里垒石造田，本来干部参加劳动在70年代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是，现在倒成了新鲜事了，进城的老百姓，不由要站下来看一看。我们也停下来，来在一个高坡上，李俊治说：“机关干部垒得质量不高，你看一看张继宁造的地，你看一看人家牛草人造的地，圪垯垒得和硷圪垯一样，这么块好石洼叫机关干部糟蹋了。垒石造田，关键是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的劳动有什么意义呢？”说实话，我当时对开发治理黄河石洼并没有多少认识，我之所以留意他的话，是为了写我的电影“台本”。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大自然为佳县造就的奇特的自然景观，以及有关这些自然景观的民间传说，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龙虎湾，可以看到龟梁，还可以看到狮子崖。龙酷似龙，虎酷似虎，龟酷似龟，狮酷似狮。传说，要是那龟头能伸到佳芦河的话，佳县就要出三斗三升菜籽官，可惜，南蛮子上来把那风水破了。我指着那龟给他看，他对这没有什么兴致，依然看石洼，突然他指着对岸一块石洼，说：“你看那一块石洼多好，修成地，栽上树，再过十年……”我依然看那龟，龟梁上去就是云岩寺了，那是宋代以前的一个石窟，里边有精美的石雕艺术。日本人占了山西之后，知道这里的石雕艺术价值很高，便用金钱收买了一些汉奸，从石壁上挖走了四个佛像。听说挖佛像的那个人，从桌子上掉下去之后就死了，对于此事，我没有去考证，但云岩石壁上，确有几个凿子凿开的窟窿，这说明日本人偷盗云岩佛像是真的了。我常想，日本人缺少的不是佛像，是石雕艺术，而我们民族的一些败类，却不仅不知道保护它，反而去破坏它，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

看了石洼，我们便又上了车，又是一会沉默，他抽了一支烟，递给我，我说，我不会，他便点着递给了司机。他一边吸，一边问：“你不是说，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地方还有什么民间传说，说给我们听听。”于是，我先讲了龟梁，又讲了云岩石窟，最后讲了《狮子崖的传说》。《狮子崖的传说》我曾寄给省里，荣获过省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奖，我讲得上口，他们听得入神。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朝廷派了一个大臣巡视天下，一路上地方官就像接待天子似的接待那大臣。可是到了佳县，县官不仅没有到百里以外去迎接，到了县城也没有安排一次像样的宴会，更没有送什么贵重礼物，只挑选了一袋红枣送那大臣，县官对那大臣说：“葭城僻处一隅，路非要冲，其列市厘者，不过本地细民，觅蝇头以为糊口计，县衙所需一丝一粟俱系平价，并无扰累百姓，葭县地瘠多山，频年亢旱，今岁又迁荒歉，宜多方抚恤，还望大人奏明圣上，早降德音……”那大臣，越听越烦，一心想找县令的岔子，可是翻遍了案卷，也

没有找出什么毛病，临走时，只得说：“你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回朝奏明圣上，抚恤难民。”老百姓听了非常高兴。

可是，不久朝廷发来御旨，指责县令贪赃枉法，不理政事，革去了他的职务。县官好像早已料到，并不忧伤叹息，摘去乌纱帽，脱了官服，收拾了简单行李，给新任县官交了印，便动身回家。老百姓哭哭啼啼去送行，送至狮子崖，他劝告大家别送了。一个老者流着泪说：“老爷，既然挽留不下，就请接受我们的跪礼吧。”话音未落，送行的男女老少都跪了下来，哭声悲天恸地，使县令难以举步。他劝大家不起，也跪了下来，老者忙去扶，县官好像石雕一般，众人连声呼叫，也不应声。原来，县官突然死去了。老百姓按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他。

一天夜里，新任县官正在德风楼上清点他的财宝，烛光突然熄灭，从西南方向射来两道光，一闪一闪，犹如两只眼睛。他正欲仔细看看，那光不见了，屋里一片漆黑，县官连忙点上了烛，发现他的银钱不翼而飞，县官好生疑惧。第二天，他亲自去查看那发光的地方，老百姓告诉他，那光是死去那个清官大老爷的目光。县官害怕了，再也不敢搜刮民财了。不过，他很快就要求调到别的地方当官去了。以后，又换了几任官，都是贪财好色之徒，据说都没有得到好的报应，不是暴病身亡，就是家舍不宁。因此佳县有“赃官坐不住”的说法。后来，不知到了什么朝代，朝廷又派来一个官，他一上任就提出在狮子崖上给那死去的清官大老爷修个纪念塔，老百姓自然十分拥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塔很快修起来了。可是，自从把塔修起之后，那光再没有出现。原来，那官暗中请了法师，在塔基上下了镇物，把那目光镇死了。从此，县官就大胆盘刮起人民来，人民叫苦连天，恨之入骨，常常面向狮子崖祈祷，希望那光再能出现。

我讲完这个故事，李俊治说：“但愿那光再能出现，县委就不用设监察机关了。”

车从峪口山上爬上去，我们把话题扯到枣树上了。李俊治说，我们往往自己不认识自己，佳县穷，可再穷的地方也有自己的优势，佳县的红枣就是一大优势，“千年松，万年槐，不知枣树何年来”。这是说枣树寿命长，“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能卖钱”，这说的是经济效益快。听到黄河水声的地方红枣就好，这说明，黄河一带很适宜红枣生长。佳县县志上有这么一段话：唯沿河一带最宜枣梨，居民种植，因为利。还有一个资料介绍，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距今有 1500 多年的历史，那时皇帝就下诏，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泥河沟就有上千年的枣树，说不定就是那时栽上的。那时的政策不错，栽上了不少枣树，我们感谢魏孝文帝。黄河沿岸土地少，人均薄荒地一亩，我们发动群众再能人均造出一亩地，全栽上枣树，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

光枣的收入就很可观了。问题是许多人受不下罪。认识了的事情，还得认真去做，毛主席不是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吗？就一般人来讲认真是很难做到的，凡能认真的人，都会做出不凡的事业。当官也不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富民一方”更不易。治穷致富，先得治愚，大凡贫穷之家，不是由于懒惰，就是由于无知。最穷的人家，往往既懒惰又无知。因此，贫穷不单单是金钱和物质的缺乏，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信心、勇气、热情、意志和知识的缺乏。口袋空的人，脑袋必然空。长期以来，国家年年给黄河一带发放救济，表面看是好事，实质上造成了永久的贫穷，我们这一回搞的是“断奶”工程，一个孩子，淡水水奶吃上，吃的时间再长，也不能自立，只有“断奶”才能自立。一个长期贫穷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懒人多的社会，一个愚人多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因此，开发治理黄河荒坡石洼，不仅是改造山河，同时也是改造人的一个综合性的伟大工程。

这一路，我们探讨了许多问题，使我不仅对开发黄河沿岸有了认识，而且，对李俊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 六

到了虢镇，李俊治要到别的乡检查工作，我便顺黄河北上，一个村一个村的采访，这一次采访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带极其严重、极其可怕的生存危机。年复一年的水土流失，把浑厚的黄土冲走了，留在这里的是一个石头的世界。这里的人缺粮、缺衣、缺水、缺土、缺女人，就是不缺石头。光棍多，破窑洞多，文盲多，超生户多。但，同时我也了解了黄河畔人为了生存和大自然搏斗的许多感人的事迹。王老十、张继宁、冯永章、任贵有、冯老三不愧是保持水土的英雄战士。还有牛草村、关口村、薛家畔、牛圈沟村，有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感人事迹。这一次我整整采访了二十多天，一路上，每到一村，我都要召开村民大会，因为这一带村子很穷，下乡干部很少光顾，也很少召开村民大会，我每到一个村首先宣布“三不”：不抽烟，不吃肉，不喝酒。这就一下子使群众和我亲近了许多。因为这些村子虽然很穷，但下乡干部一来，就得好酒好肉好烟招待，这些东西也不是全让下乡干部吃了，农村干部也吃，因此，下乡干部一走，老百姓就说下了一场冷雨。其实这样的心态，也是由于长期穷才造成的，如果富了，来了客人吃点，喝点也是人之常情。

回到县城我就迫不及待想把我采访到的情况找许浚书记汇报。我在县委院找到他，他正准备到吴堡去接贾建文副专员，他要我坐在车上汇报。于是，我就把我一路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许浚书记非常高兴。我说，能不能这次请贾专员到牛草、关口、薛家畔、牛圈沟看

看。许浚摇了摇头说，恐怕不行，贾专员到佳县只安排一天的时间，重点要到北区检查农田基建。我便有点失望，我说，你把我安排在贾专员的车上，我看看能不能说动他，许书记就把我安排在贾专员的车里。从吴堡岔上到螳镇的牛草村，也就十几里地，在这短短的时间，要打动贾专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那里的情况我熟悉，我使尽了浑身解数，展开舆论攻势。情况很好，还没等我开口，贾专员就对他的秘书说，咱们去看看。

贾专员到了牛草村，这是牛草村开天辟地以来，来的最大的官，整个牛草村沸腾了，他们垒石造田的劲头更大了。贾专员看了他们造的地，十分高兴，当时就答应给牛草村建个高抽，把黄河水抽到山上。许书记十分机灵，即口就说：我们对贾专员的支持，表示感谢！他的话音未落，憨厚的牛草村人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看了螳镇的牛草，我真想让贾专员到坑镇的关口看看，因为我在那里住了几天，那里有个蹲点干部叫冯文年，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人老实，又有水利水保方面的技术。十天前，我离开关口还对他说，关口这个点子很好，只是群众太穷，连工具都没有，用石头捣石头。你们好好干，我回到县里给许浚、李俊治汇报，给你们争取弄点工具。冯文年说，老韩你放心，这里的工作有我。这又过了二十来天，我相信那里比牛草更有看头，一定要争取让贾专员看看。许书记信心不大，因为他是有人身份的人，在比他大一级的官员前说话要有分寸，不能随便说，我就不同了，我什么都敢说。从牛草起身，我就讲关口，自然要比牛草讲得更更有吸引力。秘书已听出我的话外之意了，对贾专员说，关口是不是不去了，已经看了一处了，可贾专员却说：“走，去看看。”坑镇离关口很远，公路又不好，但一上了路，我就放心了。一路上汽车颠颠簸簸，总算到了关口村的对面山上。垒石造田的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沸腾，男女老少正在石洼上干着。关口村的人善唱，一见山上停下来那么多车，有那么多人看，冯九信就唱开了，他不仅嗓子好，而且即口就能编歌，冯九信的一首歌还没唱完，贾专员就说：“走，下去看看。”贾专员来到工地，看到有的老乡没有锤子，拿石头当锤子，石头捣石头，当时就给佳县水利局局长张程鹏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连工具都没有，怎么干？给他们一户配一套工具。”

离开关口太阳就快落山了，原本我还想请贾专员看看木头峪乡薛家畔和牛圈沟村，可是到了木头峪的李家洼天就黑了。到那两个村子看来没有希望了。木头峪乡党委书记刘加乐就在李家洼公路上等着，我再也不敢开口说什么了，我对刘加乐说：你有本事你给贾专员说，我是不敢说了，你坐贾专员的车，看有没有机会说。于是我就换在许书记车上。一上车，许书记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说：“贾专员这次一连看咱们两个点，解决了这么些问题，我梦也没梦到，你说得太好了，贾专员很满意。”我说，不是我说得好，是我的这么一种热情感

动了她，更主要的是黄河岸边的人做得好。

## 七

关口这么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村落复活了。古代这个村子名叫天庆府，城隍庙文革期间才被打掉。有几个地名曾引起了一些考古专家们关注，什么阁佬湾，校场坪，万人坑等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大搞农田基建时，时有历史文物出土，那个时候不知道文物的珍贵，被挖出来的青铜器，用船拉到蝎镇供销社当废铜卖，至今县文化馆藏有一件铜鼎扁壶，上面铸有“延寿宫”铭文，据专家鉴定是汉武帝行宫里的宝物。古墓随处可见，引来不少盗墓贼在那里盗宝。这一切说明关口有过辉煌过去，也许是物极必反规律的作用，使关口落入了低谷。上个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到了最低谷，这个村的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出去讨过吃，别人问他们是那里人，他们就说：“我们是用粮地区，缺粮县，救济公社，供应村人。”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反差啊！现在关口人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自从贾专员答应给他们每家发一套工具，他们的信心更足了，几天来，他们一面继续垒石造田，一面在热烈地讨论这件事。

五天后，李俊治突然来到关口。原来他是打前站的，许浚书记明天将带领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几套领导班子的人，专门给关口送工具。榆林电视台还要拍电视，这可把关口人喜坏了，他们在工地上做了一下简单的化妆，披挂起来，扭开了秧歌，这一点，李俊治没有想到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们扭的秧歌十分的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情感奔放的秧歌。冯四孩装了个丑老婆子，后脑上用麻扎了笤帚把似的头式，眼皮上吊着一颗大麻子，脸蛋上擦了一点红，耳朵上连着两颗枣，用女人衣服紧紧绷在他有点发胖的身子上，扭腰纵胯，酸眉醋眼，逗得满沟人笑……

当晚李俊治没有走，开了一个村民大会，李俊治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发言，他没有事先准备讲稿，即兴发言，他被关口人的那么原始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感染，有许多精彩的话也是从心底迸发出来，可惜我没有把他那次讲话记录下来。

第二天，许浚果然带着大队人马，还有榆林电视台的乔新华来到关口，在赠送工具会上，许浚讲了话，张仲旺、乔进学，拓士表都讲了话，接着关口群众又扭起了秧歌。扭了一会就唱，一个唱了又一个，一个人就唱好几首，都是他们自己即兴编的，轮不上冯占山唱，找了我几回，说他编了几个秧歌，让他唱唱，我把话筒抢过来，安排他唱，谁知，他唱开就收不住了。最后还是我硬把他拉下来。晚上还放了一场电影，周围村子的人，甚至山西都有不少

人来看，就像过节，比过节都红火。

李俊治让我、冯文年、林业站的陈秉义蹲在了关口。李俊治点子稠，他说要在石洼上大做文章，不仅要栽树，还要进行科学试验。他说他在山东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沂蒙农村党支部建设培训班总结会上发了言，表了态，说到要做到。他说通过那一次学习，对他的启发很大，把长期困扰在佳县历届领导心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黄河晋陕峡谷贫困带有没有救的问题解决了。晋陕峡谷贫困带是全国十八块贫困地区最难啃的一块。长久以来，就靠吃救济过活，就那稀水水奶，吃不饱，饿不死，这一次经济改革大潮，是一次难遇的历史机遇，如果错过这次机遇，黄河沿岸就真没有救了。要救，唯一的办法就是“断奶”。

佳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曾经因为穷，首先燃起过熊熊革命烈火，我们不能让他们老去移民，我们不能让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区人民去讨饭。移民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救济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1951年到1988年，国家给过这里两亿六千九百万斤粮食，一千七百多万元救济款，三亿一千一百四十万元财政补贴，可这里的人民还要受饿，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胃病发病率佳县居全国第一，要饭的全省第一，随着生存环境日趋恶化，随着难以控制的人口增加，再不想办法，这里就会成了一块绝地，死地……

李俊治一从山东回来，就将开发黄河晋陕峡谷贫困带的设想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敢不敢啃这块硬骨头，谁也拿不准，因为黄河沿岸的荒坡石洼连农业学大寨时都没有人碰它，现在既没资金，更主要的原因是那里太穷，人穷不做，马瘦不吃，要啃这块硬骨头，谈何容易。讨论了半天定不下来，最后决定还是派个调查组先把情况弄清楚再下决心。县委立即抽调农工部、科委、林业、水保、老区办等单位一些人员，由农工部长张生寿带队，对黄河沿岸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考察组对沿黄52个村子一个村一个村进行考察。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在晋陕峡谷，黄河却是暴虐的象征。在公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黄河也曾给沿黄村庄带来过经济、文化的繁荣，但是航运事业很快就衰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衰落、文化的衰落。他们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贫穷，土地奇缺，交通不便，现代文明在这里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人均只有不到1亩可耕种的瘠土石田，可是荒坡石洼的面积人均可达到十几亩，甚至几十亩。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一个著名的哲学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在黄河沿岸，却是一种相反的结论。只有少数人，在那里顽强地抗争着，如荷叶坪的王老十。王老十弟兄十个，到他成家的年龄，父亲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分给他，到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于是他在一干石沟里开始垒石造田栽树，每逢暴雨他就像个野人似的，浑身不挂一条丝，风里来，雨里去，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硬是在乱石林里造出十几亩

地来，栽上枣、梨、杏树 600 多株，到土改前居然成了荷叶坪的首富。王老十的业绩告诉人们：黄河沿岸穷在石洼上，富的希望也在石洼上。历时 25 天的考察结束了，李俊治听了汇报无比高兴，又一次提请县上领导讨论。由于有了详实的考察报告，很快就达到了统一的认识，于是成立了佳县沿黄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书记李俊治任组长，副县长张仲旺任副组长，下设了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从此，沿黄经济开发列入了县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一场轰轰烈烈垒石造田栽枣树的战斗打响了，许浚、李俊治经常在沿黄一带村庄跑，要求沿黄人，人均栽一百株枣树，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岂有不富之理！沉睡了几千年的黄河荒坡石洼被锤声、炮声、笑语声震醒了，多少年来，从未见过黄河畔人民有如此高的劳动热情。在黄河沿岸流传着老天爷下白面的古老神话，直到今天他们才明白，这个老天爷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拔掉穷根，栽上富根。

在这里特别应提一提的是林业专家陈秉义，新修起来的田地上都栽上了枣树苗，陈秉义说，在树苗还小的时候，地上还可种籽麻、种西瓜，种西瓜更好。种西瓜就种西瓜。西瓜种进去不久落了一场好雨，西瓜苗齐刷刷长了起来。李俊治很高兴，说西瓜一定要弄好，垒石造田当年见利，把工资贴上也要保收。可是有一天早上，冯文年从工地跑了回来，说西瓜有死苗现象。我到工地一看，果然有不少苗子叶子焉了。赶快去找陈秉义。冯文年跑到乡上打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老陈，一问单位，说他到北边朱家洼乡下乡去了，和乡政府联系，说他不知在哪个村子，村子里没电话，一时找不上。冯文年立马到了朱家洼乡跑了几个村子才把陈秉义找上。老陈赶到关口，一看，说要打抗枯宁。打过抗枯宁之后，西瓜苗又慢慢恢复了原来鲜活的状态。那一年瓜长得特别好，结了三茬，最大的西瓜 52 斤 6 两，关口人不忘县上各个部门的支持，摘了两三轮送到县城，给每一个机关抱了两颗，让大家尝，都说，关口的西瓜好，石洼上的西瓜好。

如果不是陈秉义及时把西瓜苗救了，能吃上西瓜，是不可能的。那一回，老陈不仅救了西瓜，还防治了枣虫，本来枣树上已经出现了粘虫、食心虫和枣圪几，可是谁也没有发现，老陈发现了，但他说，现在还不到打药的时候，我问什么时候才能用药，他说晚上在枣树上吊个灯泡，下面放个水盆，一个小时能诱死在水盆里十只粘虫蛾，就是打药的时候。食心虫蛾用性诱济，一小时能诱死五只时打药，将雄蛾杀死，雌蛾就成了“寡妇”，繁衍不成后代，便达到了防虫的目的。老陈真是一个专家，那一年，关口是西瓜、红枣双丰收。

《佳芦河流域》片子做成之后，我就着手做《希望之路》。做《希望之路》有较充裕的时间，我先把台本写好，然后把榆林电视台的乔新华先生请来，按台本所需拍。1991年8月31日配音剪辑完毕，共22分钟时间，就把佳县沿黄人民开发治理黄河沿岸的事情做了一个简要真实的介绍。我拿到片子急着往回赶，到了汽车站突然想起了郭生英。郭老当时是榆林地委农工部部长，有一次我把关口的事情告诉他，他就要我领着他去看看。看了关口，他很激动，说你们这是做着为生民立命的伟大事业，他要我找一处石壁，请一个著名书法家，大大刻上“为生民立命”五个字，以作永久的纪念。在返回途中到长沟条山上，响了一声雷，猛雷猛雨，就地起水，我们又没有带雨具，只得踏着泥路下山，路很滑，一步三爬，到了长沟条老乡家里，都成了泥蛋。我有点不好意思，郭老说，这算什么？还比红军长征难吗？此人，从小在私塾读四书五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颇有研究，谈吐不凡，有深邃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把这个片子给郭老看看，让他指点指点。

郭部长聚精会神地看完片子，哎呀了一声，我以为他看出了什么问题，可他接着说：“你来的晚了一点，早来两天就好了，陈俊生今天才离开榆林，让他看看一定能解决大问题。”我问陈俊生是谁？他说，陈俊生是国务委员，专管扶贫这一块。你们的李俊治提出“断奶”，这很好，可民以食为天，肚子里空空的，谁能抡得动老锤，再说，垒石造田，工具很重要，关口把工具的问题解决了，别的村子工具还没有解决，得争取点扶贫款。这样吧，你拿着片子，追到延安，让他看看。

我当夜赶回佳县，把情况给李俊治作了汇报，李俊治把县委办公室秘书叫来，连夜赶写了一个汇报材料，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延安，许浚怕我找不上陈俊生，特意给延安宾馆张俊德写了一封信，要他无论如何帮助我见上陈俊生，并解决我的住宿问题。张俊德佳县人，见了我格外的亲切，但要见陈俊生他为难了，说，陈俊生是国家二级保护人物，他连面都见不上，他建议还是去找榆林的赵兴国副专员，看能不能帮上忙。赵兴国副专员我认识，不用他引见。我找到赵专员，赵专员苦笑了一下，说，他拿个榆林治沙的片子，想请陈俊生看看，从榆林到延安还排不上。看来，谁都帮不上忙了。我急了，我从佳县专门跑下来，让他看看，想不到这事有这么难。我得想办法，找上陈俊生。事有凑巧，我刚刚从赵专员房间出来，就碰上了张生华。1978年榆林地委抽调我们写《毛主席转战陕北》，在一起好几个月，此人天庭饱满，额头亮亮的，老没有皱纹，像个娃娃似得常不老，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娃娃脸”。我一见他，说，啊呀！在这见到了“娃娃脸”，你在这做什么？张生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佳县喝面汤各老爷，你到这里做什么？我就把原委说了。张生华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何

况他现在是法制报的大记者，这一次到延安就是作会议采访的，他说全国大的新闻媒体，五十多个记者跟会采访。我说，你就别说其他的了，就说如何帮我见到陈俊生。张生华说，你要见陈俊生得找《人民日报》记者，他们肯定能认得陈俊生。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找上了《人民日报》姓王的一个记者。王记者也有些难色，我说，不管怎样先请你看看我的片子，你以为可以送陈俊生看，咱争取，如果片子不好，我就回去了。王记者说他们的时间很紧，得抓紧。我又找到张俊德要他帮忙找一个放片子的机子，张俊德说宾馆就有，于是我把王记者叫上，王记者又叫了几个同行，上了最顶上的一层楼。他们把片子看了之后，说，陈俊生就喜欢看这一类片子，看了以后一定会支持你们。于是我又有了信心，但王记者说，他不知道陈俊生住在几楼几号，如果知道，可以直接去找。陈俊生住在哪里？去问谁？谁能告诉我？我又想到了张俊德。我找到张俊德，说，你现在只要告诉我陈俊生住在几楼几号就算完成任务了。张俊德犹豫了一下，终于告诉了我，我又去找王记者，怎么也找不上了。于是，我又找上张生华，张生华拍了拍胸膛，说，走，我领你去！

我们敲开了 2 楼 16 号。陈俊生的秘书叫李宪宾，很客气，把我和张生华的名字都记在本本上说：陈俊生正和延安地区开座谈会，还没回来，等回来后，再通知我们，李秘书问我房间电话号码，我说没有电话，我就在一楼下面等着。

等了好久，也不见李秘书叫我，我估计陈俊生已回到了他的房间，于是就直接去找。刚走进二楼那个过道，就有一个女同志问：同志你找谁？我转着身子看，没有看见人，心里暗想，这一定就是二级保护监控装置发出来的声音，我也没管就直接向 16 号前进。那一天是 9 月 3 日上午 12 时。

大概陈俊生刚刚进门，门缝也开着，里边有两个人谈话，我从门缝瞧进去，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站着的那个人好像要告别的样子，我轻轻敲了敲门，没有反应，又敲，还没有反应，我就走了进去。此时，那个人正和陈俊生握手告别。

我问你是不是陈国务委员，他说是，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把想请他看看片子的事说了，并把县里的报告也给他。李秘书从里间出来，把片子和材料都接过去，陈说你先回去，下午我看了片再叫你，我说，那里边有两个片子，一个 17 分，一个 22 分，如有时间两个都看看，没有时间，就把 22 分钟那个看了就行了。陈俊生说，好好好。

我又回到一楼，坐在那把长椅子上。陈俊生是我见到的第三个大官。第一个是毛泽东，1947 年转战陕北到了佳县，就住在离我家不到 100 米远的任恕家里。听说毛主席来了，我们一群娃娃追着去看，其实毛主席和我们平常人没有两样，很和气，穿的也不好，肘上还脱着旧棉花。第二个是周恩来，1962 年周恩来陪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西安碑林，我当时在

碑林附近的西安师范上学。那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学校抽了我们校四十个师生，充当参观碑林的游客，老师让我们把新衣服穿上，我没有新衣服，新鞋倒有一双，走到碑林鞋已泥得一踏糊涂。我们进去之后，三个一组，五个一伙被教师安顿在固定的点，不准乱跑，谁知周恩来一进门，我们就直追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没有看别的，径直走，走到一通碑前站下看碑，不时微笑着还和我们交流一下眼神，我就站在周总理跟前，当时想上前和总理说几句，可没有胆量。陈俊生是我见过的第三个大人物了，我感到陈俊生也很和气，没有一点官架子，也不要官腔，如果他不在那个位置上，给人的感觉无异于一个老实憨厚的关口农民。

下午5时许，李宪宾跑来，告诉我，陈俊生正在看你们的片子，请你去。当我进去的时候，《葭芦河流域》已看过了，正在看《希望之路》。陈招呼让我坐在他身边，边看，边十分感慨地说：“你们佳县正在重绘山河啊！”我趁这个机会，就把沿黄一带如何贫困，现在垒石造田改变面貌的情况说了一通，陈说：“垒石造田是逼出来的，栽枣树很好。”我说，还可以栽花椒和桃杏。陈问花椒树可以生长多少年，我说年代不长，他又问枣树可生长多少年？我说我们佳县有上千年的枣树，陈说垒石造田不要强调种粮食，经济林发展了，就有钱花了，当然，适合种粮食的也可以种，树小的时候可以种。你们木头峪牛圈沟的经验值得推广，我在榆林听说过了，那样的生存环境，经过奋斗，达到人均960元，这很不容易，这是个很好的典型。我说，那个村109口人，8个木匠，10个石匠，人很勤劳，务实，又栽了那么多枣树，家家户户修了新窑。陈说，这很好，就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愚公移山的精神，能栽一棵就栽一棵，能栽两棵就栽两棵，年年修、年年栽、每人栽上几十棵树，就有钱花了。你们这样做不仅对晋陕峡谷有指导意义，对云贵地区也有指导意义，那里也是石头多土少。你们那样的地方还能变面貌，全国再没有变不了面貌的地方了。你们这两个片子很生动，你们的报告材料也很清楚，材料我也看了，在这一次会上要讲你们垒石造田的事。这两个片子的解说词很好，有感情，你还可以写成通讯，写报告文学，好好宣传黄河沿岸人民的艰苦创业精神。我这一次去不了佳县，下一次到了榆林一定到你们佳县看看。你们那个报告不是要工具费什么的八十万元吗？我给你们省里说说，一年固定给点钱，再给点粮，帮助你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接着他还问县委书记是谁？县长是谁？那个去大别山区学习的副书记李俊治多大岁数，还问了人口出生率，人均收入的情况。我知道的就作了回答，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临别时，陈说，你是不是要把片子带走？我说，我就这一盘，我看陈有让留下片子的意思，可我就剪辑了那么一盘，给了他，我就没戏唱了，陈说，你把材料留下，我在这一次会上要讲。

后来，陈俊生果然在延安会上讲了，陕报上全文发表了陈俊生延安会议的讲话，有三处

提到佳县垒石造田的事。过了不久，省政府每年拨来专款 50 万元，还有粮食。就在那次会议上把佳县定成了全国重点贫困县，给了佳县很大的帮助。

佳县沿黄河五十多个村庄，全长七十三公里。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上下步走了七遍，穿破七双鞋。没有白跑，使我了解了这一带的过去，也目睹了这一带的现在，更使我对文化有了本质的理解。文化，并不是识了多少字，念了多少年书，上过什么样的学校，有什么样的文凭，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出外做官如高宁远那样：“冰心不为利染，铁面不以势移。”在家务农，如张梧岗那样：“僻渠隘谷绝尘扰，课子贻孙究祖宗。”穷则如韩鉴那样：“藜藿有余终是孝，诗书犹在莫言贫。”达则如李象斗那样：“欺苍天难逃国宪，亏贫民必报子孙。”这样的境界，这样的精神，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达到。然而，并不是说所有没读书的人就达不到。响彻世界的《东方红》颂歌并不是出自伟大的音乐家，而是出自一个叫李有源的普通农民之心，经久不衰的船夫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也不是出自著名艺术家之手，而是出自一个叫李思命的船夫之口。这背后都有甚深的文化底蕴，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我十分庆幸老天把我生在黄河边上，我高兴的看到黄河沿岸的村落里至今原封不动的保留着一种可贵的精神，保留着淳朴的民风。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也许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线文化阵地，没有被污染的文化阵地，但愿这种精神、这种民风不被物欲横流所冲击、不被日益衰落的世风所污染。（1991 年 12 月于佳州）

## 绿的播种者

佳县北边有十几万亩明沙，相传是王母娘娘游览万里长城时，从她的绣鞋里倒出来的。这一倒可倒下了祸害。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呼天哭地向南迁逃。

故土难离啊！人们苦苦哀告上苍，盼望能使荒沙再变成良田和草原。盼啊盼，不知盼了多少年，多少代。可是沙漠依然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府派人来勘察沙漠。一九五六年，葭芦河畔上的打火店村建立起一个林场——打火店林场。

我要给读者报告的是在林场生活战斗了二十八年之久的林业工程师郑文翰的事迹。他一九五七年眉县林校毕业，自愿报名来陕北工作。关中道居住惯了的母亲，听说把儿子分到陕北，十分忧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北国！冻得厉害，风沙大得可怕。那里的人吃的是糠、窝窝头！”父亲说的更玄：“炎柱”！他叫了声文翰的奶名，声音都有点颤抖了：“生下你，我请人开过八字，你命里缺火，五行不全，所以我给你名字上添了两个火字。北方水盛，南方火旺，你到那，恐怕……”

下面的话没有说，可儿子知道父亲怕的是什么。不过，他是不信那一套的。母亲只得为他准备行装。她怕儿子受冻，缝了九斤棉花的一块被子，她怕儿子挨饿，烙了好多饼子。就要上车了，父亲还在叮咛：“到了陕北好好工作几年就回来，千万不能找北方女人。”

火车，汽车，小毛驴，经过十几天的旅途生活，他终于到了葭芦河畔。林场刚刚建立，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筹建场子的人和几孔借来的土窑洞。他不管这些，第二天便同韩广林同志去勘察沙漠。广林毕业于武功农校，也是一个献身沙漠建设的热血青年。他们登上沙丘，举目北眺，那黄色的波涛，一直延伸到了天边。广林说，从这往北，连着毛乌素大沙漠。现在没有风，看它怪老实，要是抖起威来，真好象无数巨龙在这里搏斗，搅得天昏地暗。一块块良田被沙化，一片片草原被沙埋。佳县境内十几万亩耕地就这样被沙龙吞噬了。县志上有这样的诗句：边尘满地无征马，塞草连天有牧牛。说明，这原是一片草原，可，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树，柳树！”文翰突然惊叫起来。在沙漠里能看到一点点绿，那可是令人万分兴奋的事。这是八棵老柳，由于风蚀，树根弯弯曲曲暴露在外面，犹如八只瘦骨嶙嶙的爪子，十分恐怖地抓着地层里的什么。除了这老柳，沙湾里稀稀拉拉长些沙竹，沙坡上偶尔有几株只死不活的沙米。

多么荒凉啊！这一个个沙丘下面，说不定就是一个什么村庄，也许周围是翠绿的田野，田埂上是茂盛的树木，远处还有一片片嫩绿的草场，草场上是一群群活奔乱叫的牛羊。现在，这沙丘却似一座座坟墓，把一切绿色的生命都掩埋了，深深地掩埋了，唯有这八棵老柳还顽强地活着……

他们走着，走着，又看见了一片绿，那是生长在崖畔上的几株柠条。几只羊伸长了脖子，在啃咬着柠条的枝叶，一个牧羊人在沙窝里打盹。这是一个沙漠老人，耳朵里，眉毛间，皱纹上，充满了沙子。当他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看沙来了，眨巴着一双经常淌着泪的红眼说：“这有什么看头？看看又能怎么样？”

此刻，文翰正在观察着对面崖畔上的一株柠条，由于崖畔的坍塌，柠条根象一条条绳索

露了出来。这么粗的根，这么长的根，使他惊叹不已，他从这根上看到了治沙的希望，兴奋地说：“我们不能用它把沙龙捆起来吗？”

老人冷笑道：“捆？哼哼，除非王母下凡把这沙子再揽到她的绣鞋里带走。”

通过这次考查，他们得到了许多有关沙漠的知识，特别是对柠条有了特殊的感情。回到林场，他们就筹集了十石柠条种子。那一天，下着雨，为了抢墒，场里的工人干部都出动了，周围村里的社员也都出动了，人们开始在荒凉的沙漠播种绿色的种子。

十几天紧张的劳动，使文翰瘦多了。母亲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里人们生活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一天，他出去半天没有回来，广林去找他，看见他正蹲在沙窝里大便。几天来，糠窝窝，粗炒面，使他大便十分困难。肛裂了，流出了鲜红鲜红的血。他有些紧张。广林说：“不要紧，过一段时间肠胃就能适应，我初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带着通便润肠的药物，服几天就会好的。”

回到林场，收到一封信，一看地址，便知是一个同学来的，陕北各县有他好些同学，他们经常书信来往，相互鼓励。可打开一看，使他吃惊了。信中写道：“文翰，你那里怎么样？我可受不了啦，我要回关中去，已向省林业厅写了报告。几个同学都伸出了援助的手，给林业厅写了信，说我病的厉害，不能在沙区工作，请你也写一封……”

苦思了几天，他写了回信：“你想离开陕北，回关中吗？那是你绿化的战场吗？同志，战斗刚刚开始，就把你吓倒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品质吗……”

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又有几个同学先后回去了。可就在那个时候，他毅然决定同一个陕北姑娘结婚了。母亲缝的那块九斤棉被解决了大问题，当时棉花奇缺，一分为二，给爱人正好缝被褥。就在那个时候，父亲东奔西波，不仅为儿子联系好了工作单位，而且在附近的一个纱厂为儿子看准了一个媳妇。

父亲怕他找个北方女人，他偏偏找了，使老人家十分生气。文翰写信安慰双亲：“你们的心情儿理解，可为了事业，我不能离开沙漠。造林，尤其是在沙漠里造林，实在难啊！现在，我在沙漠里尚未播下一块儿绿，就离去，我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干我们这一行，不是一两年就能见效，得干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才行，我决定留在这里……”

一九六八年，父亲病危，要他立即回去。他考虑再三，不能回去，因为他正在搞柠条种子虫害的研究。这项研究再不能迟延了。课题早就提出来了。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柠条种子，动员了那么多劳力，又在雨天播种进去，可出苗率是那样的低。查其原因，问题出在种子上。他从沙子里刨出种子，一个个解剖，发现没有出苗的种子，不是被虫子蛀食空空，就是里边还藏着一个胖乎乎的虫子。啊！多可恶的虫子，必须立即消灭之。可怎么个

消灭法？他翻书，翻资料，什么都找不到。他写信问省林科所，答复是：国内尚无这方面的资料。就这样，一个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过的科研课题，摆在了只有中等专业水平的一个林业技术人员的面前了。

昆虫世界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就柠条地里的昆虫，种类之繁多，样子之古怪，简直使他吃惊。有空中飞的，有地下爬的；有吐丝织网的，有调情交尾的；有的大腹便便像个绅士，有的鬼头鬼脑似个盗贼；有的身披盔甲犹如沙场战将，有的着红挂绿恰似深闺闺秀……

那么柠条种子中的虫子，是哪一种昆虫的后代呢？这种子上没孔没缝，它又是从什么地方钻进去的呢？也许那孔很小，肉眼看不见，他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观察，还是没孔没缝。他十分苦恼，强烈地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他捕捉了许多昆虫标本，有蝶类、蛾类，也有甲虫类。他把这些标本一个一个用大头针扎在标本盒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一个盒子排满了，又一个盒子。可是，这些昆虫标本里谁是柠条害虫的父本和母本呢？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不是轻而易举能成功的，开始那种急于求成的冲动过去以后，他冷静下来了。看来，只得采用饲养的办法了，也就是把幼虫养成成虫，然后研究它的生活规律，进而研究消灭的办法。他制造了几个小盒子，把太阳底下晒一会就会跳动的种子放进去，天天观察，从春到夏，从夏到冬。可是饲养还没有取得成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那场风暴比滚滚南移的黄沙来得更猛，研究中断了。

一场大型武斗刚刚结束，他就回到林场。标本没有了，资料没有了，观察日记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什么都得从头做起。为了追回逝去的岁月，他拼命工作，即使在挨批的时候，身上都带着柠条种子，一有空就解剖。为了求出榆林地区虫害的一个准确数据，为了观察幼虫的生长情况，他从榆林、横山、定边、神木等几个县弄来种子解剖。这是一种隐蔽性害虫，因此，解剖种子就成了他天天必不可少的工作。这简单的重复，在别人看来，多没意思，然而，他解剖起种子就什么都不顾了，仿佛那里有着什么乐趣。解剖了多少种子，谁也无法知道，人们只能知道，他论文里的数据，都是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求出来的。

为了饲养小小的虫子，他制造了许多饲养盒，有的放在野外，有的置于室内，有的挂在柠条枝上，有的埋在柠条根下的土里。他甚至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把一个个虫子从种子里取出来，然后放在用柠条籽磨成的面粉里。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一天，如芝麻大的两个甲虫终于破壳而出，这使他万分高兴。虫子的饲养成功意味着他的研究将要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可是，当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将两个虫子放在毒瓶里毒死的时候，虫子突然展翅飞了。

快！快找，绝不能叫跑了。他立即用被子、褥子、单子，把窗户严严实实围起来，然后

打着手电慢慢地寻找。炕上、地下、窑顶、墙缝，凡虫子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找上。他急了，不吃不睡，找了三天，还没有找上。他哭了，到陕北这么多年，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没有使他哭过，住在千佛寺的破庙里，患了那么一场大病，他没有哭过，妻子儿女恢复不了吃粮户口，给他家带来的许多麻烦没有使他哭过，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的灾难也没有使他哭过。现在为了两个小小的虫子哭了，哭得那么伤心。

理解他的唯有妻子，妻子说：“不要哭，就象生孩子，会生一个，就会生第二个。”

文翰抖着双手，拍着大腿，说：“都怪我啊，我为什么要毒死它呢？我把它关在饲养盒里饿死不就行了吗？我好蠢啊！”

妻子长叹一声，再也找不上安慰他的话了。“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这是丈夫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一误至少要误一年的时间啊！

一九六九年的五月，他的饲养盒里出现了许多虫子。接着，他就开始了害虫生活史和防治的研究。从交尾产卵到孵化幼虫，从变蛹越冬到成虫羽化，以及雌雄寿命长短，性比数量，还有害虫发生的环境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研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的办公室，既是宿舍，又是实验室。他的工作很繁忙，既要领导工人的育苗、造林、管护，又要搞研究。别的同志午休了，他顶着烈日蹲在柠条地里观察，别的同志睡眠了，他拿着半导体黑光灯还要到野外去试验。

五月是害虫成虫羽化的时节，也是文翰最忙的时候。虫子的寿命只有十几天，一年又只繁殖一代。因此，一年里头除过这十几天的时间，再就看不到这种虫子。所以，年年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像个疯子似的，日夜在外面忙。有一次看见两个虫正在交尾，当时，他还分不清雌雄，他拿出随身带的放大镜细心地观察，简直连气都不敢出，想不到虫子非常敏感，一下子飞了，飞在空中还没有分开。他跟踪追去，只顾空中，不顾脚下，一步踏空，从一个高塬上跌下去，鼻子碰破了，腿摔伤了，但他十分高兴，因为他看清了虫子的交配方式。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经过九个年头的苦心研究，他的论文《柠条像甲生活习性及其防治初步研究》，于一九七三年在《陕西林业科技》上发表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专门从事象虫研究的赵养昌先生看了他的论文和害虫的标本，不仅为虫子鉴定了学名——柠条豆象，而且来信赞赏说：“这种虫，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害虫，你们作得工作在国内还是第一次报导，是有科学价值的一项工作。”

荣誉，并没有使郑文翰停下步来，他象运动场上一个跨栏健儿，跨过一栏又跨一栏。五年之后，“紫穗槐豆象生物学及其防治的研究”又获成功。紫穗槐比柠条更容易在沙漠里成活，它不怕干旱、不怕高寒、不怕沙埋，可称得上树中“治沙之王”。无疑，这项成果有着

更大的科学价值。现在他同时进行着几个项目的研究，其中有一项，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

这一个个成果，不是天才的产物，而是一个播绿者心血的结晶。二十八年来，场领导换了十一任，职工调了百十个，可郑文翰却把自己事业的根深深扎在这里。造林、育苗、种草、科研；科研、种草、育苗、造林，年复一年，转眼就是二十八年。

“天天北风吼，日日沙南移”的可悲历史，在打火店林场所属的几万亩沙地上已经永远结束了。传说中的王母“遗祸”变成了人民的财富。一簇簇柠条，一排排紫穗槐，一片片杨树，一块块松林，还有沙蒿、沙柳所组成的四万三千亩绿，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虽然只是一丁点儿，但他是绿的播种者用几十年的劳动建造起的一座绿色的丰碑。这是一块有生命的碑，它将同秦皇万里边城共存，与王母神话联在一起永远被人们传颂。（1974年初稿于打火店林场）

## 生民赤子

佳县城北玉庄的高挨达，贩枣到山西，烂成一堆，背了一身的债，急得一家人呼天哭地。这事让佳芦镇科技副镇长强国生知道了，他立马来到玉庄。

“你们准备怎么办？”

挨达叹了一口气说：“怎么办？就一条路，跳黄河。”

强副镇长说：“除了死路，都是活路。我借你一千元建座烤枣炉，你干不干？”强副镇长搞科技扶贫，扶哪家哪家发财，扶哪村哪村变样，哪有不干之理。当下，就拉砖，请匠人，很快就在院子里垒起了一座炉。收枣没有钱，强副镇长又忙着去借。可装了炉挨达却不敢点火。

强副镇长看着红红的炉火，心里有点紧张，因为他从没干过这事，只是听了西农大陈锦屏教授的讲话，他就干开了。他想到佳县的枣，赔就赔在烂枣上，如果成功，每家建个烤炉，

枣就烂不了啦。

炉温升到 65℃，每隔 20 分钟就要进去翻一次枣，一进炉就令人窒息，人立马成了水蛋。从炉里出来，脸色煞白，头昏目眩，挨达一家看他累成那个样子，要顶一顶，他都不肯，生怕出了问题。就这样，一连烤了三炉，第三炉达到了最佳水平，被用户抢购一空。挨达胆也大了，当年就一连烤了 2500 余公斤。

一座炉不仅救了挨达一家人，而且为红枣干制闯出了一条路子。很快，全县就建起 11 座炉，年加工 5.5 万公斤，增值 65 万元，创税利 100 万元，受到国家科委、省科委、陕北建委和专家的好评。

其实，这只是他人生之路上的一个闪光点。如果追踪他的足迹，你会觉得他是一团火。

1960 年，他出生在佳县一个穷山沟里，他无缘跨入正规学校的门槛，只能在一所半耕半读的“五·七”学校里就读。他学的是林业，正是这所乡土学校引他走上了一条闪光的人生之路。

那时，他刚刚 15 岁，开学第一堂课就是栽树。老师把他们领上山，指着无垠的黄土高原说：“……我们是学林业的，我们就是绿色的天使。百年之后，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我们可以给高原留下一片绿，我们的名字虽然无法镌刻在那绿上，可我们的精神将永驻人间……”

老师的话震撼了他的心灵，毕业后他就当了方塌苗圃的技术员。学到用时方知少，苗木立枯病使他束手无策。但最后还是被他征服了，使苗木亩产高达 8 万株。每当看到树苗装上汽车被拉向远方，他心里就有一种绿色的遐想。

乌镇、下高寨、刘家山三个乡有好些盐碱坝地种不成庄稼栽不活树。他很着急，就选了两块地试验栽柳树。先挖个坑，在坑底放置石头，再垫上好土，一栽就活，光这三个乡就栽了一千多亩。现在，一坝一坝柳树都绿茂茂的成了材，亩产值可达 800 元。

最使他难忘的是试验站那段生活。

佳县山城东临黄河，西绕芦河，古称葭芦寨。西城脚下，梁上梁下，沟里沟外，密密麻麻一片枣林，枝叶相搭，绿得可爱。每到重阳节，红枣挂满枝头，红得耀眼，成为佳州一景，所谓，南河看柳，西渠城赏枣。

某年有一个砍枣树造平原的荒唐决定，于是，那枣林被一砍而光。平原算造起来了，可小得可怜，不够看上一眼。到了 1981 年，似乎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领导终于从单一抓粮的圈子里跳了出来，把目光投向林业，于是就成立了个佳县土石山区林业试验站。历史好像故意开玩笑，那试验站偏偏就设在那小平原的一个角上，使人们很容易想起那片惨遭涂炭的

枣林。

试验站的任务就是先在苗圃育苗，然后把苗子移栽到试验区。试验区就在西城洼和东城洼。县上发了通知，禁止在试验区放牧采石。县委书记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在沿黄土石山区推广。绿染黄河峡谷，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他领了十几个待业青年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不久，苗圃里就长出了油松、侧柏、刺槐、白榆、臭椿、中槐、杜梨等十几个树种。待树苗快要出圃的时候，他们早已在石洼上垒起了一块一块条田，并挖了坑，施上肥，等可以移栽的时候，他们就不失时机把树苗栽上。试验区，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由淡绿色变成了深绿色。几年之后，人们发现那里竟成了树的天地，山城也好像有了灵气。国生完全入了迷，他很少回家。

黄河护岸林、三北防护林都需要大量的苗木。试验站又成了苗圃，使他着急的是出圃周期长，裸根造林成活率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老想，却又总想不出个办法来。一天，在《花卉》报上看到人家用竹编、草编容器育苗的介绍，得到启示，他立即找牛皮纸、报纸试育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试验会引起黄委会、三北林业局的重视，不仅下达了研究课题，而且拨了研究经费。他们又成功了。8年多的时间，培育出各种容器苗木150万袋，解决了干旱地区造林成活难的问题，不仅为黄河护林岸林带、白云山旅游区提供了大量的苗木，而且还给米脂、榆林等地提供，成活率都达98%。由他撰写的课题论文，在1984年林业部、三北局举办的全国科技论文座谈会上，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论文还收编在《论文集》里。

1990年春，他又出现在秃尾河畔。秃尾河和黄河交汇处十分险峻荒凉，多少年来，无人问津。政府虽然年年发放救济，可越救越穷。老年人穿着纳袄，光棍一窝一窝……国生看到这些情景，顿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穷村子里也有富户，但大凡富户都是比别人家多了三五十株枣树。“要想富，栽枣树”，这就是结论。于是，他就发动秃尾河畔七个村子里的群众大栽枣树。他每天和群众一起栽树，山上栽完了就在石洼上垒石造田栽，就在秃尾河滩里栽。七个村的“栽枣热”遍及了朱家洼全乡。就这年，全乡完成三北防护林6305亩，黄河护岸林4833亩。朱家洼乡成了全省造林先进单位，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强国生也随之被提拔为佳芦镇科技副镇长。

他一到任，就成立了科技协会，各村成立科技小组，接着就又是印发科技材料，又是召开科技培训会。为了以点带面还抓了6个科技示范村，424个科技示范户，推广了6项红枣丰产技术，研究出了“水平带栽树法”和“炮轰胶泥栽树法”两项红枣栽植新技术，使全镇红枣生产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总产由75万公斤增加到150

万公斤，虫果率由 12% 下降到 2%。

1994 年，强副镇长和高挨达的烤枣、“佳县油枣”出现在中国首届杨陵博览会的展台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并荣获“后稷金像奖”。1995 年又获国家科委和香港振华科技扶贫奖。

(1995 年陕西日报)

## 绿 染 黄 河 岸

### —佳县叶子坪开发纪实

陕西佳县木头峪乡黄河岸边有个叫叶子坪的地方，在经济开发的热潮中，死绝还阳，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人们在那里参观过后，无不深有感触地说：开发，开发，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开发。

叶子坪曾经是黄河岸边一个有名的渡口，那时经常船来船往，商旅不断。黄河滩头，土地连片，枣树成林。客店里不仅住满了人，而且槽头上拴满了骡马牲灵，场院里卧着一帮一帮驮脚的骆驼。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难民们一批一批云集这里，叶子坪的人们支起几面大锅，不仅施食于饥民，而且免费将难民们一船一船送往山西。逃难的人们无不感激。从此，叶子坪更是誉满黄河上下。

但是，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侵蚀，滩地一块块被黄河浪吞噬了，枣树也被一株株挽走了。石山上挂着的麻袋片似的耕地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薄，有的地块则完全成了荒坡石洼。人们在这里生存不下去了，不得不逃离他乡。村落废弃了，土地废弃了，渡口废弃了，道路废弃了。多少年来，叶子坪已不是以一个村庄存在，而是以一个古老的地

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么一个死绝多年的地方，能不能开发，能不能还阳？乡党委、乡政府组织全乡干部讨论。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大家认为叶子坪可以开发，可以死绝还阳。于是，乡党委副书记冯文年和乡干部马桂军自告奋勇来到叶子坪开展工作。困难自然不少，十几孔破破烂烂的窑洞都没有门窗，院子里荒草丛生，无有人迹。曾经是骡马大店的地方更是荒凉，荒草和废墟里，横七竖八躺着十几顶当年喂牲口的石驴槽。道路也没有了，有的地方单人行走，都得攀崖附壁。叶子坪原是上村的属地，因离村子太远，十几亩滩地也弃耕了。但是，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看到，这里有这么多破窑洞可供人们居住，这么好的荒坡可以开发，这里又临黄河，有这么丰富的水资源可以利用，更使人欣喜的是，这里很适宜枣树生长。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绿染黄河岸，栽上摇钱树，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春节一过，冯文年和马桂军来到上村发动群众。上村是一个很穷的村子，用村民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村穷到骨头里头了，刨一瓜子吃一嘴，搞开发我们吃什么？真如村民说的那样，他们除去土地上的微薄收入，要糊口，就得到山西下煤窑。

搞开发，还是下煤窑？村民们定不下来。这里的人都很迷信，凡事都喜欢求神问卦，于是村民们跪在神灵下，问可不可搞开发。不巧的是连问三卦都是下下卦。当冯文年和马桂军又一次到上村时，有不少年轻人已经到山西钻煤窑了，还有的正准备走。冯文年和马桂军十分着急，但毫无办法，只得邀集村民再次问卦，可巧一卦下去，就是一个上上大吉。这样一来，村民们暂时给稳住了，但是老百姓对这两个年轻人不信任。他们私下议论：如今真抓实干的干部不多，就叶子坪这条件，他们住不上两天，不要说受别的罪，蚊子也会吓跑他们，他们一走，不就又由咱们了吗？

可是，几天之后，人们发现叶子坪冒起了炊烟。人们十分奇异，以为那里闹鬼。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光棍来到叶子坪探听虚实。原来冯文年和马桂军已在这里安下了家。门窗也安上了，炉灶也盘好了，铺盖也背来了。冯文年和马桂军见来了人，真是稀罕，又是让烟，又是倒茶，又是打饭，把几个年轻人感动得不得了。他们当下就表示，不下煤窑了，一死二活听乡上的话，搞开发。

古历三月十六日，叶子坪开发黄河荒坡的战斗打响了。但是，多数村民依然信心不足，他们说，把这荒坡修成地又能怎样？能吃，能喝？我们锅滚了，等着下米，咱们村的神也糊涂了，怎么就给了个上上大吉，唉！冯文年和马桂军想，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当年见利的问题，群众见不到实际利益，生活就要出问题。于是，进了城赊购了一套抽水设备。冯文年和马桂军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群众说：只要有这样的干部带

头，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自此，不少村民携儿带女在叶子坪破窑洞里安下了家。没有门窗，他们就用树枝，搭起简易门窗，没有水缸，他们就将埋在废墟里的石驴槽挖出来，装水。

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有一种估不透的力量。他们首先复垦了十几亩耕地，接着就垒石造田。在垒石造田中，他们坚持“统一规划，分户治理，谁造谁有，当年见利”的原则。到目前为止，十几户人家造地 35 亩，谁造地，谁栽枣树；谁造地谁利用，他们还种了西瓜，甜瓜，种了各类蔬菜。七月中旬西瓜甜瓜已经上市。这一带过去很少有人种西瓜、甜瓜，叶子坪黄河对岸就是山西省的曲峪镇，那里又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所以，西瓜甜瓜就可收入万元以上。更使人欣喜的是他们今年栽上的一千多株枣树，大都成活，长出了嫩芽新枝。随着改革开放，红枣的价格年年在上涨，这些枣树，才是他们致富的根本所在。过往的老乡，看到叶子坪一派繁盛的景象，说：叶子坪在改革开放中，死绝还阳，这真是天意啊！冯文年和马桂军不以现有的成绩为满足，他们还准备办猪场、鸡场，还要集资买一条船，使叶子坪古渡也能复活。

叶子坪“死绝还阳”给治黄人民一个极大的启示。从河口镇到禹门口，晋陕峡谷全长 725 公里。在这 725 公里黄河两岸，像叶子坪这样的荒坡石地何其多？这是我国一方可贵的土地资源，黄河水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有这两种资源，黄河带的人民何愁富不起来？贫困带上的人民何愁富不起来？

笔者希望“叶子坪现象能引起国家各方重视。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搞一个“绿染黄河”的规划，经过两代三代人的努力，晋陕峡谷贫困带将会发生震惊世界的变化。那些热衷于搞圈地开发的人们，不妨到佳县叶子坪看看，你就会明白，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开发。（1990 年于叶子坪）

## 为了我们的家园

### —来自榆林沙区的报告

蔚蓝色的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园，我们这个家园海水就占去十分之七。本来就不太多的陆地，又被荒漠覆盖了相当于一个半到两个欧洲的面积。更令人忧虑的是荒漠化还在扩大，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沙漠面积已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而且每年以 2460 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也就是说，每年荒漠化的面积比一个佳县还大的多。

有人说，土地的荒漠化是地球的癌症，这不得不引起全人类的高度重视。

榆林沙区是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总面积为 3661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56.7%。

据史料记载，这里原来是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盛的丛林草原地带。四世纪初，匈奴王赫连勃勃在此巡游，赞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如斯之美。”遂调十万之众在靖边城北兴建了“大夏”国都统万城。以后，由于征战，滥垦乱伐，使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到新中国成立时，林草覆盖率不到百分之二。

强劲的西北风卷着滚滚黄沙，遮天蔽日向南侵袭，一个个村寨被沙吞没了，一块块农田被沙埋没了，就连榆林城也处在沙丘的包围之中，等待着覆没的命运。

古老的长城无可奈何地沉睡在北国的荒漠之中，任风沙越过它的身躯向南侵袭，一点都显示不出它昔日的伟大；盛极一时的统万城被沙子埋没的只剩被当地人称之为“白城子”的残垣断壁，更令人难以想像它还有过繁华的岁月。

荒漠化的土地是死亡了的土地。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人类无节制的繁衍使从城市到乡村，没有一处令人感到不拥挤。人类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这一切，谁之过？残存在沙漠里的历史陈迹如果会说话，它们一定会老实地告诉华夏子孙，这并不是沙漠的过错，这是人类索取自然给自己的子孙种下的祸根。

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些什么，大自然就必然会向人类报复些什么。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竟然在沙区得到了不容置疑的印证。

多少年来，绿化沙漠一直是榆林人民的千古夙愿。然而在旧中国，这只能是一个永不泯灭的梦。

共和国的诞生，给榆林沙区带来了新的生机。当 1991 年 9 月，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0 名专家以《巴黎宣言》向世界呼吁重建地球绿色植被的时候，榆林人民早已在毛乌素大沙漠播下了一片令世人瞩目的新绿。

西方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的确如此，正是这难以生存的环境铸造了榆林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品格。人民政府刚刚在这块“四望黄沙，五谷不产”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来，沙区人民就以宏伟的气魄，浩大的声势向沙漠进军了。

经过几十年的奋战，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榆林人民终于扭转了“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现在，沙区造林保存面积 1460 万亩，林草覆盖率达到 40%，固定流沙 600 万亩，在沙漠边沿上建成总长 1500 公里、造林面积达 170 万亩的四条大型防风固沙林带，还在沙漠腹地营造了 165 块万亩以上的成片固沙林，受风沙危害的 140 万亩农田全部实现了林网化，沙区治理面积达到 64.4%。恢复草场 284 万亩，修建水库 205 座，新开辟农田 130 万亩，新建灌丛草原 1000 多万亩，发展养鱼水面 18 万亩。初步形成了基干林带南北对峙，护田林网纵横交

错，片块林草星罗棋布，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

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在它的庇护下，沙区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宝地，成了高标准、高效益、多功能的沙区绿洲农业的样板。

当一个人行进在茫茫沙海中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可是，当你投身到治沙大军的行列，背着用来做固沙蔽障的柴草，扛着树苗，沿着断断续续被沙子埋没的古长城，向沙漠深处进发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气壮山河，改天换地的激动。

沙区开发是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一代甚至今后几代人作出牺牲的艰难历程。榆林人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用自己的血汗重造了一条绿色的长城，这条长城将世代代屹立在北国的土地上，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第三个人类的构筑，将是我们正在不断向毛乌素沙漠深处延伸的绿色的长城。

眼前向你走来的这位老人，你能看出他曾经是六十年代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高材生，如今已是一个有多项治沙研究成果，在全国享有盛誉的高级知识分子吗？他的名字叫漆建忠。他已在沙漠里奋斗了几十年，真是染绿了黄沙，白了头啊！现在，他已到了退休年龄，可是，沙漠好像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年年依然在沙漠里播着他的绿。他是一个飞播专家。他的科研成果《榆林流动沙区飞播试验及示范》引起了国内外沙漠专家的关注，得到了“在国内尚无先例，在国外尚未见到有关报道”的赞誉。

像漆建忠这样无悔无怨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沙区建设事业的知识分子何止漆老一个！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好些刚刚从大专院校毕业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沙区和沙区人民一起战斗。“远看是个要饭的，近看是个掏炭的，一问才是个林站的”。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顺口溜，正是他们当时的生动写照。为了弄清风沙的规律，他们在风口附近搭起柳庵，进行实地观察，他们常常冒着被沙暴卷走，被流沙活埋的危险，在风口上测量风力，在沙梁上查看流沙。他们把知识奉献给沙漠，把技术传授给群众，研究出了一项又一项治沙的科研成果。

在懦夫面前，沙海无情，它可以吞噬人间的一切；在英雄面前，大漠有爱，它会袒开它博大的胸怀，任你耕耘，任你播绿。

牛玉琴不愧为一个巾帼英雄。一九八五年她和丈夫不堪忍受沙害的暴虐，决心和沙漠来一次生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丈夫终于倒下去了，但她没有被降临到她头上的灾祸吓倒，率领她的儿子继续造林不止。经过十几年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磨难，终于使两万亩荒沙披上了绿装。

现在，牛玉琴已获得多项殊荣。93年10月荣获粮农组织亚太地区“拉奥博士奖”，

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女杰”。她在沙漠里种的树，已成为世界女性的一面绿色旗帜，一座生命的丰碑。但她依然一如既往地栽树种草。因为她是沙里人，体现沙里人的人生价值不就是绿吗？世界上还有什么奖赏比这沙漠里的绿更有价值，更珍贵呢？

沙里人给治沙英雄的美称是“沙大王”。“沙大王”和“沙打旺”谐音。“沙打旺”是沙漠里生命力极强的一种植物。

定边县治沙英雄石光银就是一个闻名沙区的“沙大王”。他联合了附近六个村子的127户人家，成立了一个股份制林牧场。大家管它叫“治沙公司”。他们自筹了十万元资金，承包了61840亩沙地。

股东是他上门一户一户请来的，有一个名叫王志刚的移民户，穷的只有一头瘦毛驴，一家五口人，没有啥吃，就靠野菜树皮充饥。就这个家庭靠什么入股？可石光银就看上了他，几次上门动员，王志刚就是不敢。石光银急了说：“你怕什么？还怕你的穷没有了吗？我给你贷款，划给你500亩沙地，你就给咱栽树，栽活了算你的，死了算我的，怎么样？”就这样王志刚成了“治沙公司”的股东。十几年过去了，王志刚的500亩林，绿旺旺地长起来了。有人估算，其价值至少在三十万元以上。王志刚的腰也慢慢粗了起来，一下子就盖起了9间大瓦房。石光银不只使王志刚一家走上了富裕之路，他先后帮助32户移民户安了家，并成了“治沙公司”的股东。

现在，“治沙公司”所承包的61840亩沙地，全部得到了治理，使治理区的植物覆盖率达到91.3%。同时牧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其总价值至少在三千万元以上，年收入870万元，人均1800元。股东们都非常感激他们的“石总裁”，把他看成是泽惠沙区的大恩人。而石光银却说，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全是党的政策带来的。事实确实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榆林地委、行署及时调整了治沙政策，由过去主要靠国家、集体改为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以个体、联户为主。地区先后作出了划拨和拍卖五荒地的政策，鼓励农民承包治沙，并明确宣布谁造谁有谁受益，允许继承，允许转让。对于治沙联户、大户实行资金、种苗、技术服务“三优先”。因而涌现了如牛玉琴、石光银等一大批治沙能手，带动了沙区十万多户农民承包治沙400多万亩，出现了千家万户治沙的新局面。

沙区群众每每谈起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提起当年在他们村蹲过点、下过乡的干部同志们。从五十年代起，政府每年要选派大批干部深入沙区领导治沙工作。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苦、不怕累，在沙区为我们党树立了很好的干部形象。至今群众都惦念着他们。原榆林市委副书记冯学富就是其中一个。他熟悉沙漠，熟悉沙里人，急沙区人之所急，想沙区人之所想，一心扑在治沙事业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现在也退休了，可时有老

乡找到城里去看望他。

沙区广大群众、科技人员、党政干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绿化了榆林，同时也积累了许许多多极其宝贵的治沙经验和治沙技术，诸如飞机播种造林种草技术、前挡后拉固定流沙技术、塔设障蔽固沙造林技术、饮水拉沙治沙造田技术，还有樟子松造林技术等等。这些经验和技  
术不仅是对榆林沙区的贡献，也是对全国乃至世界的贡献。

和整个荒漠相比，榆林沙区的这么一点绿毕竟是非常渺小的，但它是生命的象征，蓬勃的标志，它是荒漠化的克星，是我们这个家园的希望。

榆林治沙成果，得到了国内外治沙界的广泛关注。十多位国家领导人来榆视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 90 年以来，先后有 64 批世界各地的治沙组织和专家前来参观考察。

向沙漠进军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大家携起手来，共同营造我们这个绿色的家园，让她变得更美好一些。（1995 年 3 月应市林业局邀请采访沙区记录）

## 希望在荒石坡上

陕西佳县，位于晋陕峡谷中段，黄河纵贯县境 7 个乡的 130 多个村庄，长达 73 公里。严重的水土流失，把黄河流经的地域早已变成了一个石头的世界，一条以贫困著称于世的地带。

佳县穷，居住在这里的人更穷。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使这里的人民能生存下去，每年都要拿出巨额粮款救济他们，还多次组织移民。但因人口的膨胀，这里的贫困面貌没有大的改观。在黄河古道上，因为超载，不知有多少船只沉没。但是，黄河上发生的沉船悲剧，并没有使黄河畔上的农民联想到自己乘坐的生存之舟早已严重“超载”。他们在这条“超载”的船上苦苦挣扎着。挣扎了一年又一年，挣扎了一代又一代。

这个贫困带到底有没有出路？有没有希望？曾使历任县委书记、历任县长熬煎过，焦虑过。但是面对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谁又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呢？他们都是怀着改变面貌的决心而来，抱着山河依旧的缺憾而去。

1989 年，佳县县委、政府组织科技人员通过实地考察论证后，提出了“发展沿黄枣树林”的整体构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0 年春，县委副书记李俊治参加了国务院在大别山区、沂蒙山区举办的扶贫学习班后，受到启示，又提出在沿黄垒石造田，栽植以枣树、花椒为主的经济林建议。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并组织科技人员对沿黄 52 个村一一进行全面考察。经过考察发现，沿黄 6 万亩坡度较缓的荒坡可以治理。荒坡上的石碴土氮磷钾含量高，很适宜红枣、花椒、苹果和桃杏生长，不仅产量高，品质也好。螭镇乡荷叶坪村有个叫王老十的农民，生前在离家很远的干石沟里，垒石造田十几年，造地 20 多亩，栽上各种经济林 600 多株，现在，这些树早已成了摇钱树，每年产值都稳定在 15000

元以上。他为造地、栽树，一年四季在沟里钻着，在沟里还修了窑，三月五月不回村。每遇暴雨，他就像个野人似的浑身一丝不挂，风里来，雨里去，硬是把石沟变成了良田。

近年来，又一个王老十式的人物——被誉为活愚公的张继宁，在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别无选择，从前年年初开始，一头扑在荒石坡上，垒石造田。共打了 54 个石堰窝，26 条石坎田，造地 15 亩，栽上各种经济林 600 多株，走出了又一条生存之路。

过去人们总认为，沿黄一带穷就穷在荒石坡上，然而，事实证明，沿黄一带富的希望也在荒石坡上。

前年 8 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沿黄垒石造田战斗打响了，沉睡了几千年的黄河荒石坡，被锤声、炮声、笑语声震醒。人们振奋了，黄河岸边要改天换地了。

佳县是著名民歌《东方红》的故乡，人们至今还记得 1942 年，人民歌手李有源，为党中央部署迁往延安的移民编了一首移民歌，歌里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佳县移民到延安，一定要开南老山，过上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移民们把这首歌从佳县一直唱到延安。谁能想到，这首移民歌，竟成了后来响彻全中国的《东方红》！从为移民谋生存，到希望过上幸福生活，是黄河两岸人民一代代美好的愿望。然而，移出去的毕竟是少数，多数黄河畔人民依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有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外流。一些外流人不愿暴露自己的籍贯，往往隐蔽地回答自己的住址：“我是用粮地区缺粮县救济公社供应村人。”这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道出了他们难言的苦衷。

经济上的贫穷，导致了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又造成了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的文化，陈旧的思想观念，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多少年来，尽管国家给黄河畔投入了不少，但投入只能维持人们生存，并没有形成他们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这条超载的船上，人们时刻担心着倾覆的命运。

现在，黄河畔人民终于找出一条生存之路，希望之路。

黄河畔上“供应村”——关口村，也行动起来了。可是因为穷，连造地的工具都买不起，县上给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工具，图生存求发展的工具，农民扭起了秧歌，跳呀，唱呀，欢欣鼓舞地向荒坡开战了。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造地 180 亩，栽上枣树 2000 多株，还种上了地膜西瓜，芝麻。当年造地当年受益，沿黄 52 个村庄，都投入垒石造田运动，造地 2400 多亩，栽上各种经济林 7 万多株。省委书记张勃兴视察后高兴地说：“你们治理黄河石坡是一大创造，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石坡不放松。要下决心，花力气，像愚公移山那样，子子孙孙治理下去，一定能解决问题。”

国务委员陈俊生听了佳县的汇报，看了录像，感慨地说：“佳县大地正在重绘山河啊！”他鼓励佳县沿黄人民，发扬延安精神，愚公精神，年年造地，年年栽树，把沿黄荒石坡治理好，为全国树立个榜样。（1991年9月中国老区报）

## 奉献在贫瘠的土地上

一辆军车从西安出发，风驰电掣般地向陕北方向驶去。车里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医院几位高级军医。他们到陕北不是去抢救某位垂危病人，而是去扶贫。临行前省军区首长嘱咐：“佳县很穷，可那是一方圣土。那里的人民厚道、勤劳、能吃苦。那里闹红早，那里的父老乡亲为创立陕北红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佳县人民又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我们要怀着深厚的感情搞好这次扶贫工作……”

佳县到了！不知谁先喊了一声，几位医生一齐向车外望去。山上到处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农民已经开始在干裂的土地上播种一年的希望。一头牛或者一头驴，拉着犁在瘠薄的土地上划出一道道浅浅的沟。历史的车轮早已把人类带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甚而太空时代，可这里还是这么的原始落后。当接近黄河时，眼前出现了一座座石山，道道石沟，岩层裸露，怪石嶙峋，显得更加荒凉……军医们深深地感到，他们将打的是一场硬仗。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三十五医院第一批去佳县扶贫的医生在佳县人民医院上了班。佳县人民医院好像注入了新的血液，整个医院都变了一个样。人们奔走相告：解放军医生来了！就诊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多，上班时间看不完，下了班接着看。晚上，有时他们刚刚入睡，突然有人敲门：“解放军医生，快去救一个病人。”他们就好像听到了命令，立马出诊。

一天，一位姓曹的老人领着他的儿子来就诊。病人的两条腿呈 X 形，走起路来十分艰难。外科武主任诊断为脑瘫。可惜儿时没有及早治疗，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只能用手术治疗，而且最少得做四次手术，可武大夫只能在佳县呆二十天。怎么办？要救小曹，就得把前三次手术并在一起做，一次手术就得开七个刀口。

手术很成功，术后三天，一切正常，为了让患者省钱，为了腾出床位接收新的病人，武大夫让小曹回家疗养，每天做完新的手术，再到小曹家里去“查房”。

小曹终于会走路了，不久还结了婚，老曹逢人便说：“是解放军医生救了我的儿子啊！”

妇产科主任于西延出生在延安，在马背摇篮里做过许许多多美好的梦。她一踏上陕北的土地就觉着山亲水亲人更亲。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早上查房，上午下午坐门诊，晚上常常还要到病房看看。她做了几例手术，很成功，边做边教。如今，佳县妇产科的同志都会用她的方法做手术了。

检验科主任张庆梅太辛苦了，她的一侧肾已切除，可她为了为佳县医院成立细菌室硬是撑着。打扫房子，搬冰箱，抬桌子，清洗玻璃器材，配制试剂什么都干。中午不休息，晚上连轴转。缺少一种试剂，她亲自跑到县防疫站联系，需要无菌血，她挽起袖子让抽。只用了十天的时间就把细菌室成立起来了。随后，又是讲课，又是实际操作。佳县的同志很快掌握了新的技术，细菌室在佳县医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张庆梅却病倒了。

多少年来她一直是全军医疗战线上的一位先进工作者，受到诸多奖励。最使她难忘的是毛主席都接见过她。她也曾为有此殊荣而自慰。可是，面对这贫瘠的土地，面对陕北父老，她觉得自己做的太少了。她说，她要尽她的所能为老区人民多做事。她毅然决定扶助两个失学儿童上学，一个由她扶助，一个由她的儿子扶助。因为她知道，扶贫要扶本，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许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其实，张庆梅所想到的问题，省军区领导早已想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由省领导区投资修建的一所希望小学在佳县螭镇乡高崖畔村落成了。省军区副司令员樊剑英说得好：“大凡贫困地区不仅经济贫乏，人材更贫乏。经济的差异说到底还是人的素质的差异。因此，扶贫要从根本上扶。贫困是个顽症，只治表不治里，是不行的。”

两年来，三十五医院的官兵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发扬前辈的作风，在扶贫攻坚战中打了一个个漂亮的胜仗。“一九九七年我们要把佳县人民医院创二甲医院的任务拿下来”，是他们当年的“作战”计划之一。

(1997年)

## 撒播富种的人

——记我国著名食品专家雷光增

为了开发佳县的红枣资源，让佳县人民过上美好富裕的生活，一个年近古稀的老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到偏远、贫穷的佳县帮助工作。

他，就是我国著名食品专家、三北林业局食品技术顾问、河北省科委技术顾问、承德地区轻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雷光增。

雷老早年留学日本，精通酿酒技术。他先后研制成功的兴隆红果酒、猕猴桃酒、山葡萄

酒、燕塞大曲、中化沙棘酒、八珍御酒等畅销全国，享誉海外。他亲手帮助办起的酒厂就有几十个。

1986年，雷光增同志在三北林业局了解到佳县盛产优质红枣，但缺乏加工技术，便于当年8月实地考察了佳县的红枣资源。那时，黄河滩头，黄土坡上，到外都可见到果实累累的枣树。多好的资源啊！雷老激动了。一个扶助佳县开发红枣资源，脱贫致富的念头在他心里萌发了。

1987年1月，雷老正准备来佳县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经承德医院多方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出院后，医生让他休息，至少两年不能出门，身边随时准备“吸氧器”，以便及时抢救。老伴、儿女更为他的健康担心，一步也不让他离开家门。雷老只好在家里开始了试验，他先后为佳县红枣设计了53个系列产品。

1988年12月，北师大地理系和佳县政府邀请一些专家、教授，在北师大召开红枣开发论证会。雷老带着氧气瓶和急救药品参加了会议。

今年，他不听医生和老伴的劝阻，带着氧气瓶和药物，再次离家，于3月16日到达佳县。他到佳县短短几天，就为佳县红枣公司配制了3种可口的饮料，一种合成白酒。他为白酒取名“白云春”，三种饮料，一种叫“白云枣露”，一种叫“清喉可乐”，还有一种叫“浓糖枣汁”。他为佳县红枣设计的53个品种，其中有几种是通过北京一些老中医搞到的宫廷秘方。他要把这53个产品的配方、工艺以及应注意的事项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佳县人民。他说：“我在这有限的的时间里，不多为佳县人民办点事，就是死了，也不得安生啊！”

雷老这种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佳县人民。

（1989年）

## 启开聋哑的圣母

大概自从有了人类以来就有了聋哑人。人类一直探索的神秘之门——哑门，虽然并没有被关死。然而，要想启开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杨锐就是一个聋哑儿的母亲。她为了解开这哑门之谜，整整花了 14 年的时间，硬是用母亲心底涌流的那条爱河，把儿子从无声世界带了出来。现在，她的儿子不仅能说，能写，能画，而且准备参加高考。“别因残疾丧壮志，敢与健杰争殊荣”。这副曾经一直是希望儿子奋发自强的座右铭，1988 年堂堂正正贴在康复学校教室的门柱上，但是谁也没有看明白这位启开哑门的圣母此时此刻的真实用心。原来，她已下决心要以“幼吾幼”之心，惠及“人之幼”。这楹联，就是她执教的圭臬，也是她一心期望的所有聋哑学生都要达到的康复标准。

康复学校自创办已两经寒暑，陆续进校的聋哑儿童，在她和伙伴们通过种种特殊途径，一个个开口说话了。可是一看那个坛场，谁都会明白她们是在极端困难中度过来的。但是她们还是一不向家长收费，二不向国家要钱。以至市教育局长又是亲切又是生气地说：“你们再不收费，我就不领导你们了。”杨锐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她告诉伙伴们：“我们很需要钱。没有钱，就不能工作，不能前进。但目下最需要的是—种品质，—种精神，那就是母爱和奉献。”这大概就是许多家长把她比做中国的安妮·沙利文，誉为“塞上活雷锋”的缘故吧。

### (一)

1972 年的冬天，杨锐已是 3 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女儿未过周岁就会说话了，可她万万没想到，儿子到两岁半了还不开口说话，这使她非常焦虑。妈妈却说：“贵人开口迟，长大自然会说的。”妈妈的话并没有驱散她心上的愁云，她想，要是儿子真成了个哑巴，那就会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永远压在她和丈夫的背上。她索性把儿子送到他外婆家里，祈盼着儿子开口说话的那一天。那时她正在本公社一个村里当民办教师。为了不让同事们知道她有一

个不会说话的儿子，她从来没有把儿子带到学校。可是，有一天，儿子突然出现在学校里。那时儿子才4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上妈妈的。她总以为是外婆把他领来的，可等了半天却不见外婆的面。

杨锐只得把这个使她走不在人前的儿子留在身边。她急切地等着放假，一放假她就带着儿子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相信医生会有办法的。可是，检查结果：聋哑症。

这个诊断结果，太可怕了。

“难道就没有治了吗？”她哭着问医生。

“有治，不过现在娃娃小，等长大了，经过针灸治疗，也许会打开他的哑门。”显然，这是一句安慰她的话，可她当了个真，一直期待着。为了照应儿子，她要求带了幼儿班，让儿子也坐在教室里。她发现儿子并不比别的孩子差，别人会写的他也会。但这丝毫没有使她的心情轻松多少。她不让儿子在人面前唧唧呀呀，也不让儿子像别的哑巴那样打手势。有口不会说话，已够残酷了，在母亲跟前儿子连发出哑巴声音的权利也没有了，做哑语的权利都没有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怕，怕别人说这个女人生了个哑巴。

有一次，儿子画了一幅画让她看。画里有一个留着短发的女人，一手拿着碗，一手拿着筷子，正在冒着气的锅上面，好像在搅拌着什么。她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儿子要告诉她什么。原来，昨天孩子饿了，她给他拌了一碗高粱面疙瘩，今天他又要吃，因此画了这画。她很快给儿子拌了疙瘩。儿子为母亲明白了他的意思，高兴得手舞足蹈。从那以后，儿子就用画和母亲对话。有时为了给母亲说清楚一个意思，这样画不行，又那样画，在他小小的脑瓜里，构思了多少幅画啊！这件事给了母亲一个启示：要是让他学会书面语言，不就省事多了吗？于是她给儿子开始教字。凡是她家里、院里、硷畔上，能叫上名字的物体，都写上字块，天天教。儿子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名词，接着又教动词，形容词。为了给儿子教会一个词，她常常像个演员似的，给儿子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就这样，儿子终于可以用简单的书面语言和她对话了，这使她十分高兴。为了更好地教育儿子，她辞退了教书的差事，跟随在县里工作的丈夫进了城，潜心教子。刘欣8岁了，他发现同他一起玩的孩子们一个个到南关小学去上学，也闹着要去。一个聋哑儿，校方是不会收的。她好说歹说，总算说通了一位班主任老师，答应让她的儿子“旁听”。儿子异常高兴，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从不迟到早退，作业也做得很整洁，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

“六·一”节到了。这一天好些儿童光荣入队，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刘欣回到家里硬要妈妈给他也做一条，母亲作难了。

戴红领巾是个组织问题，怎么能随随便便自己做呢？儿子弄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给他

做，又哭又闹，不吃饭，也不去学校。母亲毫无办法，只得给儿子也做了一条。儿子高兴了，戴着红领巾，飞也似的到学校去了。可是，不到放学时，儿子又回来了，一头扎在妈妈怀里，哭得好伤心啊！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到学校一问，才知道，因为他不是队员，人家不让站在队列里。儿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气之下再也不去学校了。为这事，母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

做一个聋哑人多么难啊！

医生当年说下的话又响在她的耳边。她决意要领儿子治病去。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治病开始了。她是见医求医，遇神求神，跑了不少大医院，跑了不少聋哑学校，也访了不少名医，花了不少的钱。可是到头来，还是不济事。原来，“一针下去就能使聋哑人说话”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她失望了，整天沉浸在无比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二女儿带回一本介绍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书。海伦一岁半，因病成了瞎子、聋子、哑子，可在老师安妮·沙利文的终生陪教下，不仅学会了讲话，而且掌握了5国的文字，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教育家，被誉为美国的高级公民，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安妮·沙利文能办到的事她就办不到吗？为了弄清楚安妮是怎样打开海伦的哑门，她同丈夫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其实，哑巴说话，在世界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南斯拉夫70年代就宣布他们国家为世界上第一个“无哑国”。别的国家能办到的事，我们就不行吗？从此，海伦——安妮，成了她生活旅途上的一盏明灯。

## （二）

1985年，她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河北赵县有一所聋哑康复学校。她同丈夫立即带儿子到了那里。这是位姓白的大夫办的私立学校。据说白大夫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经他针灸，先后有300多名聋哑儿童听到了声音；同时，还教孩子发音，有的孩子不仅会说话，还会唱歌。

她领着孩子请大夫检查。

“孩子多大了？”大夫问。

“14岁。”

“从检查看，好像是因受震造成的耳聋。太晚了，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呢？”

大夫的一些话好比一瓢冷水浇在她的头上。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聋哑儿童康复的最佳年龄是3——6岁，这孩子14岁了，康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白大夫怎么也不肯收。但是，做母亲的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她给学校扫地，烧水，还主动给学校看每天从全国各地发来的不计其数的信件。这一封封信件，都是用聋哑人父母的血和泪写的。她十分认真地看了，分

了类，又按白大夫的意思，一一回复。

白大夫被她这种精神感动了，终于答应收下她的儿子。但迟迟不肯编班。这可把杨锐急坏了。学校不编班，她就自己教。可儿子怎么也不开口。经过十几天的努力，儿子总算开了口，但学起来很是吃力。10个数字，整整教了25天。在这25天里，她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从早到晚地教。教上几分钟，儿子就满头大汗，不得不休息一会。她发现儿子发不出声是因为没有气。于是，她做了风车让儿子吹，买了气球让儿子随时随地随便吹。练了好长时间，儿子终于气旺了。接着就教儿子学汉语拼音。经过30天的苦练，儿子终于学会了拼音。为了使儿子更好地掌握发音的部位，她和丈夫共同研究，绘制了一套音素图。白大夫被这个女人惊人的毅力感动了，于是，就聘请她当聋哑教师，月工资80元。

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了，原来给他教会的字、词、词组、短句，只要注上拼音。儿子就能读出来，这使她太高兴了。学校聘请她当教师她答应了，可工资她不挣。她在这个学校一干就是3年。但这时她的两个女儿由于失去大人的照顾，先后都得过几乎抢救不过来的大病，成为最为昂贵的学费。但学费没有白花，来自全国各地的聋哑儿童，给她提供了大面积观察聋哑儿童的机会。在这3年的时间里，为她进一步研究聋哑儿童心理学、聋校教育学，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学会了针灸，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她带的班，连她的儿子共22个学生，是几个班教学质量最高的。1986年，美国朋友很有兴致地听了她的课，还邀请孩子们唱歌、跳舞。河北电视台还录了像，录了音。正在该校考察的延安聋哑学校一位负责人得知她是陕北人，便提出要以高薪招聘她去任教，她谢绝了。白大夫也要求她留在河北，她也谢绝了。她带着儿子回到家乡，决心办一所榆林人信得过、住得起、同全国所有聋哑学校都不同的免费聋哑儿童康复学校。

### (三)

杨锐回到榆林，很快被一些聋哑人的家长知道了。有一天，一位老太太找上门，说不管收多少钱，都要把她的孙子收下。杨锐立即答应了，可就是不收钱。孩子叫雷红，才6岁。不仅要训练她说话，而且吃饭、睡觉、穿衣、洗脸洗脚，甚至大小便都是她管。刚刚收下雷红没几天，又一连收了3个。她家6口人，已不是小家口人家了，一下增加了4个，而且一个个又都是哑巴，简直使她的家乱了套。白天忙一天，晚上一边睡两个，给这个盖被子，叫那个撒尿，忙得喘不过气来。妈妈对她不收费很不理解，说：“人家当个保姆，一个月还挣四五十块，咱家这么困难，一分钱也不挣，图个甚？”两个女儿看她太累了，也怨她，说：“妈，看把你累成个甚？河北教了3年聋哑儿童，那是因为有个弟弟。现在你受这个罪，何苦呢？”

杨锐没有泄气。不几天，一个木匠找上门来，硬是要把他的儿子收下。木匠说：“你就行行好，把他收下吧，这孩子命苦，他妈死了……”木匠说着就哭了起来。她心软了，孩子是个哑巴，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够苦的人了，又死了妈妈。唉！收就收下吧。不过，她这个家实在是住不下了，这么多人，做饭也成了问题。这孩子只得在自己家里吃住，还得当木匠的爸爸天天接送。这些条件木匠全都答应了，可事实上他根本办不到，有时出外干活，连家都不回。杨锐怕孩子在路上出了问题，天天要接送，有时干脆就留在她家，还把刘欣穿过的几件衣服给这孩子穿了。

这所聋哑儿童私塾很快被更多的聋哑儿家长知道了，要求入学的人踢塌门槛，不仅有榆林地区的，还有河北的，内蒙的，山东的，延安的。她看着这么多聋哑儿得不到抢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吗？她要办一所聋哑康复学校，办一所真正让家长放心的聋哑学校，学文化，学手艺，好在这个世界上讨口饭吃。可是，她看到有些聋哑学校都安着铁门铁窗，八小时一过就把孩子们锁起来，这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监狱来。这些聋哑儿本来应该得到社会上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爱。可事实上，他们得到的却那么少，这一点也许只有做母亲的才能想到。她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样的学校，也不忍心让别的聋哑儿住那样的学校。她后悔没有一开始就办起一所大一点点的学校。看来，她必须走出家庭的圈子，面向社会。这不仅是聋哑儿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她的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持。于是，他们很快租赁了几间民房，正式发了招生简章。简章里写道：本校将严格按照国家教委、民政部、中国残联《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意见》和市教育局的要求，通过特殊途径，完成国家统编普通小学教材的教学任务。学制确定为9年，头3年，以学前语文、数学课本为教材，重点抢救并恢复说话能力；后6年完成小学六年制语文、数学课本的教学安排。从入学第七年起开始职业教育，由学生自己选修一技。修业期满，使学生的文化知识达到小学毕业水平，学会用口头语交流思想，熟练掌握一项专门技术，毕业后留校就业。还规定：本校入学聋哑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即，不收学费，不收办公费，不收房租费和水电费。

这一义举不仅得到了聋哑人家长的支持，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有的送来了床、桌子，凳子，有的送了收录机、电视机、风琴，还有一个运输专业户把一辆大轿车捐赠给学校。人常说，重赏之下有勇夫，其实，义举更有感召。奉献，本身就有一种伟大的凝聚力。清润县离休老教师王笔峰，得知杨锐义务办学的消息，离开自己舒适的家庭，来到榆林，帮助建校。还有几个知识青年也来到学校参加义务教学。于是，一所学生不交学费，教师不挣工资的学校办起来了。现在，学校有38名学生，8名教师。几间租赁来的民房已被挤得满满的，然而要求入学的聋哑儿还有很多、很多，这使杨锐又有些焦急了。

#### (四)

这是一所新型的聋哑儿童康复学校。她向学生发出的口号是：“不向世界乞同情，敢与健杰争殊荣”。她给教师们规定的榜样就是海伦·凯勒——安尼·沙利文。

这是一所充满了母爱的学校。教师亦是保姆，时时处处以母亲的名义要求自己，在最低的工作条件下向聋哑儿童提供最佳的服务。教师不仅教学，还得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生全部住校，不放寒暑假，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杨锐身体力行，既是学生的老师，又是老师的老师。她已是45岁的人了，可整天和孩子们一起，训练他们说话，教他们学文化，教他们唱歌，跳舞。她把家全撇了，学校离她的家那么近，可常常十天半月都不回一次家。而学校，她却一天都不肯离开。她说：教一个聋哑儿说话，比教一个狼孩说话困难得多。因为狼孩有听力，而这些孩子十哑九聋。因此，教师必须和母亲一样，经常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把教与学贯穿在全部生活里边。

有一个叫亮亮的孩子，在这几十个学生里是康复说话最好的一个。去年教师节大会上和永飞说了一段对口快板，轰动了会场。他现在说起话来，那么流畅，简直使人不能相信这孩子原来是个哑巴。

谁也没有想到，杨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亮亮带出了无声的世界。

贾丽梅，是榆林市郊一个农民的女儿，今年9岁，一点听力都没有。她很聪明，可就是有一股牛脾气，一不高兴，三天两天不开口，为教这个孩子，杨锐下了九牛二虎之力。首先她要把爱，母爱真诚地献给孩子，才有可能训练她。由于没有听力，学说话，全靠看口型，有的从发音方式看也看不来，就得用触觉感觉，让孩子摸她发音时脖子的变化情形。100以内的数字，整整教了7个月。她总把“三”念成“单”，为了纠正这个发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总算度过了难关，丽梅不仅学会了拼音，还学会了写字，算术。

母亲总喜欢为自己的儿女设计美好的未来，杨锐在仔细地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她坚信才成于偏，成于执。老天爷给了残疾人这个条件，把她们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因此残疾人是一个成功率最高的人群，我们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发掘这个人才库。她勉励她的同伴们：努力吧，中国的海伦，就在咱们的这些孩子们中间。（1988年于榆林）

## 贾正兰

贾正兰，和我女儿同岁，是一个很年轻的县长，延安大学毕业，有思想，文笔也美，又管着文化这一口，因此，我有事就去找她。

2006年9月26日，佳县白云观要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论道会”，这是我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专家论道”、“道长讲道”、“商家悟道”、“百姓说道”，各显其能。我属“百姓说道”组的成员，我们这个组八人，每人要求准备一篇论文。贾县长召集我们开了会，她的思路清晰，语言精炼，短短几句话，就让我们领会了大会的宗旨，知道应该怎么去准备。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办义塾已五年了，有许多孩子可以把《道德经》从头至尾背

下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一次，我领着我九岁的孙子韩谦到白云山游玩，他发现一座庙的背后刻着《道德经》，他就读那经文，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赞赏。我想，如果能让孩子们在论道会上展示一下，既是对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又会对弘扬民族文化产生一些影响。可我当时并没有向她提出，但这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萦绕。“论道会”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要做这件事，还得准备一下。我就暗暗做着准备，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她。那一天，她正在文化馆审查民歌比赛节目，我一直等她审查完，她问我有什么事，我便说，想让孩子们在“论道会”上背诵背诵《道德经》，她说好啊！这一定会是“论道会”上的一个亮点。我顺便说，如果那样，得给孩子们缝上一套衣服，整齐一点较好。她问多少孩子，我说三十三个，她没有做多少思考就答应了。于是我立即张罗买布，因为时间太紧，缝好还要在正面印上“燕翼书院”四个字，背上印上“仁爱”两个字，工序还真不少，得立即动员全家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可是第二天，她打来电话，说：“老韩，别缝了。会议议程早就定了，没有安排这一项。”从她的口气里听出，她争取过，可因为我说的太迟，大会无法安排进去。这是我的错。我一时定不下来是否把贾县长的话告诉我的家人和孩子们，准备工作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论道会”一天比一天近，我祈盼着事情有个转机。

就在大会的前一天，贾县长又打来电话，说：“老韩，好消息，这次论道会，让孩子们在论道亭‘童子诵读’。缝衣服怕是来不及了。”我说：“已经缝好了，字也印上了。”贾县长说，太好了，我马上过来看看。

贾县长来了，她走进教室，孩子们拍着小手，齐声说道：“欢迎光临，欢迎指导。”贾县长被孩子们的热情感染了，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孩子们接着就为她表演了诵读的“节目”，贾县长高兴极了，她即兴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你们太幸运了，你们学的东西太有用了，你们长大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才……”

孔子说：“道不远人。”的确，圣人之道就在天地之间，在人群之中，就在自己的周围。只要至诚，圣人之道就可以入乎耳，入乎耳而后存乎心，存乎心而后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翻开县志看看，清代之前即使如佳县这样的边塞之地，县官都是进士出身。民国也一样，县官都是从高等学府来的。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下面的人缺少文化，可头头脑脑也都是有文化高智商的优秀分子。不要说毛、刘、周、朱，就是佳县早期的县委书记杜嗣尧、张俊贤、李身修、李文光都是文武全才，上了战场是将军，下了战场是能臣。后来新解放区需要大量干部建立政权，老解放区经过几十年的革命风雨锻炼出来的优秀人物一下子都南下了。当地的干部急需补充，于是不得不把一些粗识字，甚至不识字的农村积极分子选到领导岗位

上。他们之中，有的出身于长工，有的出身于脚户，做具体工作有胆有识，生龙活虎，拿得起，放得下。可是一到会场就成了无嘴的葫芦，张口动舌都得靠秘书。就那样还会常常弄出笑话，如把“狠抓”读成“狼抓”，“衷心感谢”说成“哀心感谢”，“滥竽充数”念成了“烂竿充数”，等等，常常引得哄堂大笑。时代使他们辉煌，时代也使他们尴尬。后来的领导干部虽然慢慢有了些文化，但文化都不深，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才发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向，时代的呼唤。但这种趋向，这种呼唤，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一直还被笼罩在打倒孔家店历史烟尘中的人们看不到，听不到。贾正兰看到了，听到了，她从燕翼童子诵读声中看到时代的曙光，她热情地支持孩子们从小诵读经典。她尽管很忙，可一次又一次来到孩子们中间，她的那几句话，孩子们已当成了名言，一直记着。我常常问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贾县长说的那几句话吗？他们就会齐声说：“你们太幸运了，你们学的这些东西太有用了，你们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才！”

从无嘴葫芦到口若悬河，从粗识字甚至不识字到大学文凭，博士学位，从打倒孔家店到处修建孔子学院，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文化的觉醒，是一个政权走向成熟的标志。

历史反复证明，经济大发展的潮流，必然引发文化大繁荣的潮流，必然造就一大批有深厚文化，有德行，有业绩的基层领导人来。时代将使他们辉煌，不再会使他们尴尬。

几十年后，燕翼学子果然成了人才，如果把这看作是一种成果，这成果一定有贾正兰的一份。

## 白春阳

2004年12月4日，我在新修的教室挂上了“葭州国学书院”的牌子。那一天，我请来了白春阳、张明贵、马培存、柴汝范、高振平、乔存利、姜继成等一些文化名流以及一些学生家长，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议。

白春阳的发言令我震惊，他当时是佳县委常委，很年轻，口才又好。我们原来并不认识，虽然我也在县委工作了两三年，但自从离开之后，“无公事，不入公门”，因此新来了什么书记、常委也不甚了解。后来，我的大儿子出了一本《韩晓峰硬笔书法》，我听说白春阳爱好书法，就特意送了他一本。

过了几天，他突然来到我家，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文化底蕴很深，还纠正了我一个白字。《韩晓峰硬笔书法》的序言是我作的，里边“再接再厉”的厉字，印成了“励”。那个字，书印出之后我才发现，白春阳虽然没有直说，可我已明白他的意思。后生可畏啊！就他这个年龄，就有如此深的治学功夫的人我还没有见过。

弘扬民族文化的春风已使万物复苏，到处呈现出春意盎然的喜人景象，可佳县这块封闭太久的土地依然有些寒意，我想请一些有份量的人物讲讲话，以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于是我想到了白春阳。

白春阳果然来了，他的即兴发言，质量很高，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他说：“非常事是非常人做出来的，老韩能在佳县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做了这么一件有深远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事，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饱含着浓厚的民族感情，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奇葩和精品。从甲骨文、金文，到篆、隶、楷、草、行，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令世界叹为观止；先秦诸子百家文化，以其深邃的思想性，观察事物的开阔性和理论的严密性，构筑了一座百花齐放的文化殿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楹联等，均以汉字所特有的功能而形成的文化，使世界各国文化所无法具有和取代。这种文化的优秀品质怎能不使世界各国为之肃然起敬？怎能不让炎黄子孙为之由衷自豪？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爱国爱家乡，仁民爱物的情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些情结就是爱国主义核心价值的具体体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那些生理和心理处于迅速发育时期，可塑性很大的青少年，接受怎样的文化，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打开窗户，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而且，首先要大力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经典抓起，从青少年抓起，让他们在充分汲取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厚德载物的情怀，这很重要。优秀的民族文化，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灵魂所在……”

白春阳的讲话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他讲话没有拿稿子，甚至连个提纲都没有列，但每一句话都很精炼，又有真情实感，很有震撼力。

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我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和他交谈，会发现一些独到的见解常常在他言语中闪现，古文经典里的话，随时都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说出来，而且他能把那句话出自什么什么经典都能肯定地说出来，如“德，国家之基也”，“礼之用，和为贵”，“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政者，正也”，等等。他甚至可以把《增广贤文》中的一些精彩段落说出来，如“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我不明白他这么个年龄何以喜欢上古文经典，何以能记得那么烂熟。后来我才知道，在文革期间，他在一个柜子圪崂里翻出个包，打开一看，是些古书。那个时候发现了古书，就是四旧，要烧掉。他祖母虽然不识字，但她说书是宝贝，不能烧，就把那些书保存下来。到他在榆林农校读书时，有时间就读《幼学琼林》，读《三字经》之类的东西，读着读着就喜欢上古文经典。现在有个说法，说许多人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之根了，的确如此，可白春阳的文化之根原本就有，是他自己从小养就的。我虽然年岁比他大，可接触这些东西却比他晚的多，因此，我不能不佩服他。

韩愈在他的《师说》里说：唉！从师求学的风尚已经失传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难很不容易了。古时候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着老师学习，请教。现在的一般人，远远地逊于圣人，却以从师求学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其实，无师自通的人古来就有，一个人没有师，只要肯钻研，只要找到了根，自学也会成功的，白春阳就是一例。

白春阳说，非常事，是非常人做出来的。但我做的这件事，并不是一件非常的事，因此，我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人，这只是他对我的一种鼓励。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能做好。我相信，再过三五年，会有很多人做。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全族人的事，大家的事大家做，才能成功。